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8月31日第15期 总第19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3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一）

目 录

【专稿】

- 蔡鸣乔 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 2

【评论】

- 古 柯 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 8
- 宫香政 答魏明、梁珊、陈子明、林爻先生 24
- 附：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宣言 41

【述往】

- 刘 冰 在清华“渣滓洞”十个月（胡鹏池改写） 45
- 吴 琼 难忘的燕园·1969（六）——尾声 63
-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八）
——两派对立 65
-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二）
——单人监禁 69

【资料】

- 吴美潮 1957年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97
- 梁幼志编 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大事记残篇（1966—1967） 98

【读者来信】

1. 冯科臣读《记忆》感想两则 2. 郑大同谈高校专辑 103

【本刊声明】

【专稿】

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

蔡鸣乔

内容提要

反思文革有三个主要层次。本文结合作者发表在《记忆》电刊第150期上的《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一文阐述从人性角度的层次审视那一段历史的写作意图；结合史实，揭示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一体两面性；探讨普通人如何才能坚守人性之善、抑制人性之恶。

1. 反思文革的三个层次

启之先生编写的《水木风雨》中有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深思：陆小宝的《流着眼泪剥洋葱》[1]。在这篇深刻独到、思想性极强的文章第二部分提出了反思文革有三个主要层次的观点：第一层次，反思文革中发生的具体事件，为后人提供历史真相。第二层次，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反思文革，从社会制度上探究文革产生的原因。第三层次，在更深入的文化层次上反思文革。结合陆小宝全文的思想，我理解第三个层次的重点为“从人性为本的价值观出发的反思”。

第一层次的工作当然十分重要，只要揭示的内容有依据，真实可靠，就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曾经有朋友在看了我的那篇《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一文后，向我提出质疑：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怎么对当时的细节甚至年月日都记得那么清楚？对于这种质疑，我想回答的是：一件事情，对有的人是过眼烟云，对有的人却是刻骨铭心，这与此事对这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程度有关。我的这篇回忆中凡是用准确的用语叙述的每一件事和人、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是有文字记录为依据的。对于无法考证落实的，都用模

糊的用语表述。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个年代的一所大学里(北师大)发生的一次事件中(“4.26事件”)一个人的一段遭遇留下一篇信史。

第二层次,从政治层面反思文革,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现实的情况是,从这个层次探讨的人,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所谓“文革是权力之争”“文革是路线之争”“文革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尝试”“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等等,形成了所谓“观念撕裂现象”。吊诡的是,这种“观念撕裂”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早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就已经对文革作了“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结论。在官方已有明确结论的前提下,尚有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论文革的理论如何正确、实践如何合理,若想超越那个《决议》反思出个子午卯酉从而把什么东西改变个一二三四,岂非天方夜谭?

对师大的文革从政治层面反思,势必牵涉到如何评价师大两派群众组织,如何评价谭厚兰和王颂平。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深深感到,一方面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很少了解学校两派头头的背后活动及他们接触中央高层的内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很难跳出自己当时所持的观点立场,极易造成主观片面甚至受派性的局限,从而有失公正,在许多问题上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因此,在我的原稿中有一大段对“造反兵团”的评价及对“4.26事件”的主观分析,在定稿时都删掉了。最近看了李潇先生的《回忆十年文化史论课》[2]一文,文中的两段话使我深受启发:“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都真心标榜相同的革命理想与拥护对象。”“在一元的革命斗争话语之下形成了竞争关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谁跳出了那种特殊语境的窠臼?杨继绳先生说过:“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总之,从政治层面反思文革实在是个力气活,还是留给有能力的人去做吧!

所以,我在写《拿捏》一文时,选择了从人性的角度审视那一段往事,姑且算是从第

三个层面反思文革的一种尝试吧。

2. 基于“以人性为本的价值观”的反思

有朋友看了我那篇回忆后说，对我和苗的爱情故事很感动。我想说，我写那篇回忆，决不是为了秀我们的爱情故事。但现在给很多朋友却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确实很令人无奈，也许和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太差有关。在那篇回忆中，涉及到的几十位人物，无一不是从揭示人性的角度叙述了那一个个故事，生旦净末丑、忠勇善恶奸，一一登场。

人性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处于险恶的环境，人性中的各个侧面就都暴露出来了。有的人，从来也没有和我持相同的观点和立场，但在我倒霉的时候却不肯落井下石，想方设法给我安慰和温情，甚至顶着压力为我说情。有的人，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却告密出卖者有之、冷箭伤人者有之、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者有之！有的人，用当时一些所谓坚定份子的观点看“立场不坚定了”，却能够冒着天大的风险为我通风报信。怎么解释这些现象？难道还能用“党性”“派性”还是其它什么基于政治的属性标准去衡量吗？只有从超越这些的人性角度才能解释这一切！

什么是人性？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除了性善论还有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等学说。我个人赞同人性中既有善又有恶，善恶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人人概莫能外。

基于“以人性为本的价值观”去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

我们说，文革是一场浩劫，是因为它反智、反文明、反人性，文革是人性的炼狱！著

名作家崔巍的女儿崔敏谈文革时说：“文革是人性的大暴露，什么人，通过文革，全明白了。”“不要以为文革烟消尘灭了。”“中国人秉性不好。我就敢讲，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全会跳出来的。”“再来一次文革，你们看着吧，跳出来的人多着呢。人们啊，千万小心呐！”

文革是一场由领袖发动、群众参与的“群众运动”，动员之广、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众、运动之剧烈史无前例。清华大学唐少杰先生认为，“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是一体两面的，即运动在其形式上是“群众运动”，而使其得以存在的基础则是“运动群众”。群众首先要能够被运动起来，才会接着去自动运动。

那么，作为“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双方主体，是在哪些契合点上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使全社会进入到那种癫狂的状态呢？如果用物理原理比喻这一现象，文革中全社会的癫狂状态可以比喻为机械振动中的共振，机械振动需要有振动源和传播振动的介质，而当振源的振动频率与介质的固有频率相吻合时，振动将越来越剧烈直至极限，这就是共振。举个具体的例子：火箭发射时，发动机就是振源，火箭箭体的材质、结构、形状决定了箭体的固有频率这个参数，当发动机的振动频率和箭体的固有频率相吻合时，火箭升空时将产生剧烈的振动甚至共振，造成火箭的解体。请注意：在没有条件改变发动机的性能参数时，设计师选择的最有效的做法就是通过改变箭体的材质、结构、形状等来改变火箭箭体的固有频率，从而避免箭体在发动机的策动下发生共振。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作为传播振动的介质——“群众”，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基因中，有哪些“固有频率”与策动振动的振源频率相吻合？这些基因中，有那些片段是外界植入的？那些是自身固有的？历史不会机械地重复，当改头换面的“类文革”出现时，这个问题不解决，谁敢保证自己不是崔敏说的那个“跳出来的人”？

东方文化熏陶下的国民性中有一些历史沉淀下来的人性基因：膜拜权威、迷信名人、渴望明君，习惯于人身依附，歧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这种人性基因无疑是被策动引起共振的“固有频率”，要改造这个基因，又是一个非个人功力所能完成的宏大课题。但我

们可以从自己做起，探讨如何才能独善其身。

3. 正视人性的弱点，弘扬人性之善、抑制人性之恶

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有弱点，所以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应当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人性表现。我不否认我人性中的缺陷，前面说过，我写那篇回忆的内容都是有文字依据的，其中就包括我在囚室中写的检讨和交代材料。我承认，在被人抓住小辫子以后，在泰山压顶之下我会屈服、会认错，这没什么可丢人的，我只要不乱招供乱咬人就行了！同样，被抓到怀柔去的同学在压力之下认错、检讨、自我批判甚至揭发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毕竟我们那时都太年轻，太没有政治经验，狂热、冲动、偏执但很脆弱。我那篇回忆的初稿有三万多字，定稿时删减成不到两万字，这样大面积的删减，使得有几个地方故事没有按逻辑发展，例如，那年10月初，怀柔的解放军已经对我说了：“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这应当是对我的审查作结论的一段话，但为什么在11月初怀柔“学习班”结束时，别的同学都自由了，回到各自的班级了，却对我继续单独隔离？这里面有什么故事？为什么要做这些删减，是要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吗？当然不是，我只是不想伤害不该伤害的人！

那篇回忆中有一个细节，在我从囚室中放出来后，到苗致平的家里去拜望她的母亲，言谈中对同时被抓的一位同学没有实事求是、乱招供略有怨言，老人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呢！”老人这轻轻的一句话当时让我极其震撼并铭记终生。这不仅仅是大度，而是在那一瞬间闪现的一种人性之善，是经历过苦难后的睿智！我曾经和苗致平探讨过老人的这一表现，她说：“可能和我爸爸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有关吧！”

那篇回忆中有一个片段，在我从囚室中放出来后，有一天经过“绿园”碰到一位熟悉的中文系老师，我高兴地上前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却冷冷地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在

里面交代了不少问题吧！”这一幕像刀刻一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今天回过头去看“绿园”中那位老师的话，我想，其实是他陷入了一个人性之恶的误区。长期以来我们受到的宣传教育都是：无论在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中，甚至在观念、观点的交锋中，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可让步、妥协，更不能屈服，否则就是投降叛变！所以，不能善待朝鲜战场上被俘后历经磨难归来的志愿军战俘，不能信任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危险在敌后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在这种极左的、反人性观念的支配下，所有“进去过”的人都一定是“叛徒”，于是，“叛徒”这顶帽子就成了文革中致对手于死地的利器，于是，就有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伍豪事件”等等。

人性是有弱点的，我们要正视人性的弱点，正确对待人性的弱点，才能避免人性之恶，弘扬人性之善！

人性中有弱点不要紧，但不要在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并未面临危机的时候也要肆意地展现自己的人性之恶！那些文革初期出身“红五类”的某些专政队员们，当他们用棍棒砸到那些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所谓“牛鬼蛇神”肉体上时，他们的心为什么不震颤呢？他们有必要这样彰显自己的革命性吗？当然，也有在任何情况下不肯泯灭人性之善的勇敢者，正因为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他们身上焕发出的人性光辉才格外璀璨夺目！这两类人都应当属于少数。

品味人性，对于处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在面临危机时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性善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容易显示，在危及自身生存或安全的环境中很多人会展示人性恶而自保。这也能解释了文革中为什么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人突然遭到整肃的时候，原来越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旦反戈一击起来越是凶狠，相反，原来相对疏远的人里有时倒能给予一些温情。

最后，我想说一件小小的趣事。有一位朋友在谈到“4.26事件”时说：“当时被抓到怀柔去的人里，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直到最后没有屈服，我没有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所以一直没有低头！”她的这段话意味深长。我只想说，所谓“没有让他们抓住把柄”，

说明有的人善于保护自己。我就不信，在师大那种环境下，谁心里不清楚谭厚兰的后台是谁？只不过有的人心知肚明却从不说出来而已，像我这种总是做蠢事的人把它说出来了，于是让人抓住了把柄。而一旦让人抓住了把柄，你还指望宁死不屈、决不招供么？《红岩》《江姐》一类的小说影视剧看得太投入了吧？

所以，学会保护自己，其实也是在创造独善其身的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 启之主编：《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独立|作家）

[2] 李潇：《回忆十年文化史论课》(<https://mp.weixin.qq.com/s/>)

2017. 8. 3

【评论】

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

古柯

《记忆》第172期所刊俞小平的文章《真相的迷雾——答章铎校友》（以下简称俞文）中有两段与军队有关的话，谨摘录如下：

1968年8月19日起，毛泽东派驻北大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大，由63军执掌大权。军方对北大两派态度大不相同，驻石家庄的63军支持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而驻保定的38军则支持井冈山兵团。以至于韩爱晶记录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里说：“毛主席说：你（俞小平注：指聂元梓）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

军，你就该做38军工作。”这还不够清楚吗？连毛泽东都知道63军支持聂元梓。

聂元梓在北大掌权的两年里（1966年8月～1968年8月），校文革频繁地把很多反对她的人和组织打成“现行反革命”。63军为首的工宣队在他们掌权的7个月里（1968年8月～1969年3月），在北大整了九百多个专案，其中整人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校文革和北大公社提交的。我所亲见的被整的人，几乎都是井冈山或非井非公社的，而鲜见公社的。校文革在武斗中就在抓樊立勤、牛辉林和徐运扑等人的多个“反革命集团”案，并且开过多次批斗会。工宣队对井冈山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打击，与校文革在武斗中对那些同样的“反革命集团”的打击毫无二致，不是昭然若揭吗？

俞文以上说法，涉及三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 一、38军介入北大两派的冲突了吗？
- 二、63军介入北大的两派斗争了吗？
- 三、宣传队听谁的指令，是听中央的还是听聂元梓的？

第一个问题，38军介入北大两派的冲突了吗？

答案是明确的：没有。

据笔者所知，38军没有插手过北京的文革，更没有来过北大，他们如何支持北大井冈山？或许，38军的个别人，曾以某种原因来过北大，表示过支持井冈山，但个别人的意见能代表38军吗？俞文既然说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请提供证据，38军是如何支持北大井冈山的，笔者也很想知道。

1968年北大武斗期间，确实有过关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的流言，但那恐怕是井冈山自己制造的肥皂泡。《聂元梓回忆录》第237～238页引用了除隐患战斗队队长、时任简报组组长的赵建文所写的一段文字：

与军队有关的，还有一件事。当时有传言，38军是支持我们对立面北大“井冈山”的，而且传得很邪乎。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是很理智的，没有头脑发热，没有做出有损于人民军队的行动。我们通过高等军事学院的人——38军军长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时，他们曾经是该军长的老师——介绍去找38军，说明情况。我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卢平一道去保定，到38军军部去。到了保定一下火车，我们就被包围了。当地的武斗人员用枪指着我们，问是“天派”还是“地派”的。我说我们是“天派”，是聂元梓一派的，来保定找38军的。结果他们就让我们通过了。到38军，和军里的领导谈得很好，他们说，我们对北京的事情从来都不参与。这样，澄清了38军的态度，消除了误会，阻止了北大校内武斗的升级，也维护了38军的声誉。毛主席知道我们找38军谈话的事，在“七·二八”召见会上还称赞我们做得对。

俞文引用毛泽东7.28召见时讲的另一句话：“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这句话并不能证明38军是支持北大井冈山的。毛泽东说的是“如果……真……”，这是一种假设，即便不是完全否定，也是半否定的。“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这句话，也是在“如果”的前提下说的。聂元梓应该做的、能做的，实际上早已做过了，38军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对北京的事情从来都不参与”，话已经说到头了，聂元梓除了相信这是真话，还能做什么呢？毛泽东既然说了“还有你们派人到38军这事办的好”，还要怎么“做38军的工作”呢？再说，7.28之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已经轮不到聂元梓再去做什么工作了。

文革发动50年后，俞文再提38军支持井冈山这个伪命题，是给人民军队抹黑！

关于第二个问题，63军和北大的关系

1967年元月，北大作为军训的试点，63军的部分官兵奉命来北大帮助搞军训。63军不是自己要来的，更不是聂元梓凭关系拉来的，而是上级派他们来的。63军派出的千人左右军训人员在北大做的工作：支左、军训、大联合，等等，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新北大公社就是军训和按系统大联合的产物。对于63军来说，支持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试问，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支持“井”、“红”来反对校文革吗？（况且，“井”、“红”在军训开始前就已经垮台了）。

军训结束后，1967年2月18日，军训团大部分人就回去了，只有少量人员奉命留在北大。

1967年1月高教部夺权时，北大在卢正义问题上坚持原则，遭到北师大“井冈山”的反夺权，并且遭到关锋、王力的打压。这个过程，63军的军训人员是亲身经历了的，有人还挨了打。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反对吴传启一伙的斗争，以及陈伯达6.5讲话之后北大出现的乱局，63军留守人员是亲眼看到了的。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令人欣慰的是，1967年9月17日，当他们完全撤离北大时，关锋、王力已经垮台，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在他们撤走以后，直到武斗期间，再没有他们的身影和表态。

文革时，在石家庄地区支左问题上存在两支部队的矛盾，但不是38军和63军，而是铁道兵工程学院的造反派和63军。铁道兵工程学院在石家庄，该学院的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站在地方一派群众组织“狂人公社”一边，和63军支持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相对立。

北大井冈山是“狂人公社”的支持者，“狂人公社”也是北大井冈山的积极的支持者。1967年8月17日，在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的大会上，石家庄“狂人公社”代表十四个组织联合发言，祝贺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其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战友们，你们的大联合是真正的、革命的大联合！不是象新北大公社那样的大杂烩。你们的大联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战友们，外地造反派日夜仰望着北京，对于首都的群众组织，谁革谁保，地方上看得

很清楚。大量的事实说明，“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黑风前资产阶级开始向无产阶级反扑的产物，这是为二月黑风准备的一支组织力量。二月黑风以来，它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到处扶植老保，镇压革命造反派。他们镇压过钢二司，镇压过川大八·二六，镇压过河南二七公社，镇压过湘江风雷。在河北，它的黑手伸向了邯郸、邢台、张家口、唐山等地，给这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同时也伸向了石家庄，猖狂地镇压石家庄的“狂人”。但是，几个嗡嗡叫的苍蝇吓不住革命“狂人”，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从三十人发展到十万余人。今天，我们要向新北大公社挑战。聂元梓、孙蓬一你们敢展开一场辩论吗？新北大公社渣派们，有胆量吗？大量事实也说明，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奔波于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与我们共同战斗，与我们血雨同舟，在此，我们代表石家庄十万“狂人”，河北八五风暴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们誓与你们战斗在一起，流血在一起，牺牲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狂人公社”是石家庄地区一个极左组织，他们自己是一个“大杂烩”（陈伯达1967.10.27的评语），¹居然指责新北大公社是“大杂烩”，实在可笑。

作为“狂人公社”重要支柱的铁道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派很早就参与了北京的文革纠纷，甚至到北大校园里来挑衅。这是为什么？他们的背后都有些什么人？

《北京大学记事》记载：

（1967年）1月24-26日 高教部“延安公社”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大批人到北大校内示威游行、刷标语，反对聂元梓。北大红旗兵团则提出：“反对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¹ 石家庄“狂人公社”里有一支“滹沱河义和团”，居然是由劳改释放犯组成的。参见草根博客刘普伟的博客：《石家庄的武斗》，<http://blog.Sina.com.cn/liupuwei>

对这一事件，1967.1.27 北大“动态报”有过报道和评论：

这是为什么？——值得注意的动向

近几天来，发生几件值得高度警惕的事情：24日下午，高教部《延安公社》一伙杀气腾腾地闯到北大来，歇斯底里的狂叫：“卢正义、徐非光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反卢正义没有好下场”，同时还恶毒污蔑帮助我校军训的解放军同志。25日深夜高教部、教育部的八一八红卫兵红旗造反团、《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三十多人，鼓目而来，叫嚷什么“新北大夺权兵团在高教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喋喋不休，不一而足。26日下午，铁道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装甲兵工程学院、交通部的大汉们，也相继冲来，恶毒地说什么“刘主席派工作组，中央文革派你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什么“冲解放军报社是革命行动”，狂嚎“打倒一小撮铁杆保皇派”，向北大革命师生示威，还公然咬伤我革命同学，挑起武斗的严重事件。大连海运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四、五十人还冲进我夺权指挥部，气势汹汹，蛮不讲理，扬言“我们就是要搞一搞大北大主义”，“管一管你们的修正主义办公室”，并非法将我办公室二人绑架，由楼上拖到楼下，还大骂解放军是“保皇派”。在高教部，他们还唆使大小喽罗，贴出反动的大字报，说什么“聂元梓的反造定了”、“想保聂元梓办不到”、“不把北大所谓夺权兵团赶出高教部我们誓不罢休”，肆无忌惮地制造反革命舆论。不过三日，他们这一小撮接踵而来，其调子如出一辙，面目何其相似！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铁道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校、大连海运学院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同北大素无瓜葛，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对北大的攻击？

实际上，他们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保卢正义，帮助卢正义一伙在教育部和高教部夺取权力。支持卢正义的正是王、关、戚、林杰、吴传启一伙，北师大井冈山是支持卢正义的最大的群众组织，铁道兵工程学院的那些穿军装的人，居然同卢正义一伙搭上了关

系，如果他们不是受人愚弄、代人出头的话，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卢正义进过国民党的江苏省反省院，有过变节行为，是个叛徒，后来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解放后爬上了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的高位。文革伊始，以为投机的机会来了，写了高教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一度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卢的历史问题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这样的人怎么配当“左派”？因此在高教、教育两部引起激烈争议。当时，江青逼迫陶铸去高教部和学部宣布卢正义和吴传启是“左派”，以支持和保护他们。陶铸坚决不去学部，但去了高教部。但陶铸的讲话留有很大余地，他没有否定卢有历史问题，只是肯定了卢贴大字报一事。因为后者，反对卢正义的人后来说卢是“陶保派”。但卢正义、吴传启这伙人有王、关、戚作后台，凡事得风气之先，不久便抢先贴了反陶铸的大字报，摇身一变成了“反陶英雄”。尽管卢正义捞足了政治资本，自以为是“响当当的左派”，但人们并不买账。当时北大的群众组织“红旗兵团”就坚决不承认卢是左派。陶铸被打倒后，在所谓“批陶”会议的问题上，以及后来高教部、教育部夺权的问题上，对于如何看待卢正义和以卢为首的“延安公社”，北大同林杰、谭厚兰一伙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和争论。林杰、谭厚兰一伙一定要保卢正义，这就是高教部“延安公社”、高教部和教育部的“八一八红卫兵红旗造反团”、“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到北大示威的根由。

这件事情，不妨看看谭厚兰后来是怎么说的。

关锋、王力、林杰、吴传启一伙垮台之后，1967年11月15日晚北师大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作过一次检查，其中提到了卢正义的问题：

第二个是在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在教育部我们支持延安公社，北大支持北京公社，也吵得很厉害，但林杰也是无孔不入地发表意见，加剧了矛盾的发展，甚至还去慰问我们被北大打伤了的的同学，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把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卢正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北大的同志指出卢正义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决同他划清界限。但我们却出自派性，再加上林杰的支持，不但不接受新

北大同志的意见，反而一意孤行，公开为叛徒卢正义辩护，说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说他是叛徒的材料“不充分”，“当时他还很年轻，没有形成定型的世界观”等极其错误的论调，根本不愿意去进行调查研究和作认真的阶级分析。在卢正义问题上犯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听信林杰的话，把敌人当朋友看待，这是立场性的错误。¹

关锋、林杰、吴传启、洪涛这个团伙，在1月4日陈伯达、江青讲话公开打倒陶铸之后破门而出，随后又欺骗、拉拢了一些高校群众组织，形成了北京文革舞台上的一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力量。

卢正义不过是个副司级干部，为什么会引起康生、关锋、林杰、吴传启这一大伙人出来死保他呢？为什么煽动北师大井冈山同北大武斗来死保卢正义呢？笔者大为疑惑，惑而不解近五十年，直到不久以前，经朋友指点，读到丁健先生所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缅怀刘季平同志》一文，²这才恍然大悟。

据丁健先生所述，卢正义是张春桥的故交，历史上两次被捕变节。第一次被捕后，神秘逃到张春桥处躲藏，张春桥多次写材料证明卢没问题。至1967年，张不愿再写证明。不久，卢潜逃湖北，被教育部群众抓获，在武汉至南京的长江轮中失踪，至今没有下落。

卢正义的历史问题牵扯到张春桥，难怪他们要死保卢正义了，难怪他们要挑动北师大“井冈山”来反对北大，不惜武斗也要搞反夺权了，难怪关锋、王力要亲自出马，对北大进行打压了。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正好证明他们是一个借文革之机搞阴谋的团伙吗？他们很担心卢正义落到群众手里，倘若卢正义交待了他被捕变节的详细情况，再扯上张春桥，那不就有大麻烦了吗？联想到毛泽东至死都不让查张春桥，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这些支持卢正义的人，同时叫嚷“冲解放军报社是革命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又

¹ 谭厚兰：《斗私批修，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油印件。

² 丁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缅怀刘季平同志》，原载《南通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有什么背景呢？

1967年1月，解放军报社也发生夺权斗争。外部单位介入，一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报社。北大反对冲击解放军报社的行动，派人到现场发表声明。这下惹恼了这伙军队造反派，于是发生了到北大来示威的一幕。

对解放军报社夺权的问题，林彪1月17日有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劝说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¹

陈伯达对报社也有过电话通知：

1967.1.20下午3点，电话说：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闹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犯者，就会犯错误。²

北大反对冲击解放军报社，有什么错呢？解放军报社上有军委，军委主席是毛泽东，群众组织有什么资格去干预解放军报社内部事务、去冲击报社呢？

笔者当年未曾关注过河北省的文革进程，借写本文之机，才在网上查了一下。从有限的材料中得知，石家庄的造反派在1967年分成两派：反军派和拥军派。反军派由铁道兵学院（京字501部队）为后盾，以河北师大“东方红”、铁路工人的“火车头”等造反组织为中坚，对外统称“狂人公社”（后改名“鲁迅公社”）。该派指导思想是“抓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对石家庄军管会极端仇视，经常冲击驻石各部队，抢劫枪支弹

¹ 北大《动态报》34期 1967.1.19

² 北大《动态报》37期 1967.1.23

药，殴打甚至杀害军人。¹ 但是，随着关锋、王力垮台，反军浪潮得到遏制，这个“狂人公社”也没有能狂多久，很快就垮台了。在石家庄，拥军派的力量更为强大，他们以63军、第九步兵学校（京字320部队）、省军区为后盾，得到大多数工人、市民支持。1967年12月20日，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1月29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由此取代保定成为省会。²

从“狂人公社”的代表在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大会上发出向新北大公社挑衅的狂言，到这个组织的覆亡，不过两个月零几天的时间，这是那个代表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关于第三个问题，宣传队听谁的指令，是听中央的还是听聂元梓的？

1968年7、8月份，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大学“领导一切”，这是毛泽东的部署，全国都一样。军队是讲服从上级命令的。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率军宣队来到北大，是上级派来的。北大还有工宣队，应该是北京市革委会派遣的。应当说，北大的事情，刘信做不了主，63军军长也做不了主，工宣队也作不了主，他们的直接领导者，应该是北京市革委会和谢富治。后面的指挥者是中央文革和毛泽东。

宣传队在北大的工作，最受诟病的就是“清队”的严重扩大化，900多人受审查，20多人自杀。

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天下大乱”，发生了“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本来是毛泽东自己所希望的，也是王、关、戚和中央文革极左路线造成的结果。但毛泽东不这么看。面对全国许多地方派性斗争激烈，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的现象，毛泽东十分恼火，他不许批判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而在全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并且在反“右倾”的狂潮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1968年3月，毛泽东又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¹ 孟德后人的博客：《红校往事》，[attp://blog.Sina.com.cn/cao20085](http://blog.Sina.com.cn/cao20085)

² 草根博客刘普伟的博客：《石家庄的武斗》，[attp://blog.Sina.com.cn/liupuwei](http://blog.Sina.com.cn/liupuwei)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4月10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里公布后，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思想武器。“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了打击一大片，冤假错案遍于全国的严重后果。具体到北大，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同他先前认为北大是一个“反动堡垒”、“池深王八多”的看法，以及后来宣传队关于“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说法，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其目的就是要结束“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派性角度出发，把北大“清队”说成是一派压一派的观点，既不符合事实，更是掩盖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性质。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呈送毛泽东。5月19日，毛泽东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这一材料，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由此在全国开展，这个材料，以及以后另外一些材料，都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指导性文件，流布全国，影响全国。

笔者不了解新华印刷厂的这件材料是否符合实际，文革史学者杨继绳也没有找到这个样板的真实情况的资料，但他找到了另一个样板——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资料。去这个厂的军宣队也是8341部队派出的，二七厂也成为毛泽东的“试点”或“样板”。毛泽东深信他的警卫人员是不会弄虚作假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杨继绳指出，“二七厂，这个‘注意政策’的样板单位，原来是8341部队制造的一个假典型。……1978年7月，铁道部派出工作组，与北京市工业交通办公室一起，帮助二七厂落实政策。经调查核实，1969年影响全国并被毛泽东引用的这个‘报告’（指该厂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里的许多材料，竟然是假的。”¹

¹ 杨继绳：《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第597页。

杨继绳在书中介绍了二七厂这个假典型的详细情况后写道：“二七厂这个清队样板，使北京市群众大受其害。”¹（为篇幅计，有关具体情况，本文不作赘引——引者）

在北京市，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中称：北京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揪出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清理了阶级队伍，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谢富治在会上说：“目前，全市各单位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最新指示精神，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都在进行这一项工作。”

北京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出现了大批自杀现象。1968年7月4日，北京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第二次报告》。《报告》中说，清队中出现了坐飞机、挂牌子、打人、刑讯、逼供、游行等错误做法。前一段死人较多，全市自杀1687人，打死157人，其中农村自杀1262人，打死145人，现在正在对错误做法进行纠正。²

1968年9月2日，北京市革委会办事组在《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的报告中说：截至8月8日，全市已有68000多人被“揪出”，由于实行了群众专政，7、8两月有430人被毒打致死。11月18日，市革委会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中说：截至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已达80100人，其中：叛徒3297人，特务4761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320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反动学术权威203人，反动资本家2319人，新挖出的五类分子14435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7565人，其他坏分子14320人。³

以上是1968年年内北京市的情况，但不知道以上数字是否包括北大这样的高校。可以

¹ 杨继绳：《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第599页。

²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3—675页。

³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7—678页。

看出，自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来，全社会都处在紧张和亢奋之中，没有哪个单位可以置身事外，不受影响。北大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严重扩大化，是必然的。

按上级文件精神，校文革在1968年4月所立三个专案组（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抓对立派中的反革命小集团，涉及人员约20名（抓到个别人）。这些专案，想借清理阶级队伍之机，打击对立派，这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否定的，但追究的罪名，都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当时没有相应法律，只有《公安六条》，而按照《公安六条》，这都是严重的问题。总结文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1968年3月以后，井冈山兵团长期囚禁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这又如何解释呢？

俞文称“63军为首的工宣队……在北大整了九百多个专案，其中整人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提交的。”请俞先生说明，你是如何知道“整人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提交的”，请提供证据。

众所周知，工宣队进校后，新北大公社首先自行宣布解散，所有成员回系、回班。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之时，作为群众组织的新北大公社已不存在，随后又有大批学生毕业离校，所以，新北大公社与“清理阶级队伍”并无关系。

工、军宣传队进校，打着“毛主席亲自派来的”旗号，实践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使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宣传队一开始的口号是“清查陆平黑班底”，矛头所向，首先是干部和教师队伍，连教研室组长，陆平树立的学习标兵，都在清查之列，打击面之宽可以想象。很短时间内便有二十多人自杀。文革开始两年多了，这些人一直没有自杀，为什么要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自杀？笔者认为，这与某个军或某个工厂的宣传队并无直接关系，与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无直接关系。这是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换成别的军或工厂的宣传队，情况也会一样。1968年7月27日，8341部队率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在随后的清队、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共有24人自杀，其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自杀19人。¹

¹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名单》，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启之编-台北市：独立作家，

崔雄崑是原校党委常委、教务长，文革中被校文革结合进领导班子，任校文革常委。1967年12月，崔曾遭北大“井冈山”绑架，罪名是“迫害林副主席”。“清队”开始后，崔被工、军宣传队指为“陆平黑班底”而遭审查，于1968年10月17日投湖自杀。按照俞文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整崔雄崑的材料是北大“井冈山”提交的吗？

在宣传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至1968年9月下旬，就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按每人一个专案组计算，就有900多个专案组。假设，其中20来个人的材料可能和校文革原来的工作有关，那么，另外那么多专案的由头是什么呢？材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以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解放前的历史问题，还有一部分属于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沉积下来的问题，许多人的材料，可能来自于档案。熟悉这些档案的人，只有原党委的人事干部，各系原总支负责人。文革期间的两派群众是不了解这些的。如历史系文革主任吴维能，是小八路出身，“清队”时工、军宣传队追究的却是他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开全系批斗会，致使吴于1968年11月4日投湖身亡。吴维能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派的，难道可以说他的自杀是因为“井冈山”提供了材料？

有的专案，如导致翦伯赞夫妇自杀一案，主要责任人应是中央专案组，同北大并无直接关系。

宣传队进校后，在打倒派性的口号下，号召两派群众揭发自己的领导人，怎么能说只打击井冈山一派呢？聂元梓、孙蓬一都是被揭发的对象，下边的还揭发魏杞文、胡宗式等。“井冈山”方面也揭发了不少自己领导人的问题。据参加过宣传队时期的牛辉林专案的一位校友写于1970年1月的一份材料记叙，有关牛辉林的材料，主要来自牛辉林等八人自己的交待和互相揭发，还有王、关、戚团伙成员洪涛、刘郢、王恩宇、徐非光、……以及彭炎、阮波等人的交待。牛辉林等人攻击的对象，并不是我们原来听说的仅江青一人，还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如此广泛的材料，若不是内部互相揭发，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编造不出来的。材料中提到的彭炎、阮波，笔者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北大“井冈山”有许多人“奔波于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同那里的一些组织“共同战斗”，反对63军，这是63军官兵都领教过的。军宣队进校后追究了吗？

“红旗飘”中某些人的思想，放在数十年后的现在看，或许应予肯定。但当时却不能这样看，连他们自己也不这样看，他们自己也认为是反动的。原“红旗飘”成员屈长江在数十年后发表的《良知漫漶的岁月》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

自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对毛泽东及其后期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陆陆续续地说出了一些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议论和怨言。贾平凹说，话有三说。我们选择的基本是第三种。比如，说毛主席搞的是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一言堂啦；林彪的“四个第一”“一句顶一万句”和“顶峰论”是唯心主义，像个赫鲁晓夫啦；有一种文革理论叫“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啦；中央文革出尔反尔搞两面手法推罪给群众组织头头啦；说刘少奇是叛徒是天大的笑话啦；彭德怀反党集团是冤案啦；等等。这些话放在数十年以后，人人都会说自己也是这么想过，这么说过的，可在当时确实是十恶不赦的反动言论。

终于有一天，我们暴露了。校文革的头头聂元梓把我们定为“牛辉林现行反革命小集团”，把材料报到了中央。虽然毛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不要杀牛宰猴”，“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攻击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引自《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但下面的人可不作此想。于是，我们这几个人就被对方的群众组织、工宣队、军宣队和后来的八三四一部队先后隔离审查了若干次，若干年月。先是被军宣队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交给群众专政监督改造。后被八三四一部队定为“五一六”分子，不了而了之。¹

¹ 屈长江：《良知漫漶的岁月》，载丛璋、亚达、国真编：《燕园风云录》（四），2016年8月

“红旗飘”成员这些“大逆不道的议论和怨言”是如何暴露的，文章的作者没有说，笔者当年不知道，至今仍一无所知。几个人在小屋子里的议论，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人张扬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在那时，详细情况是不可以传播的，传播也是罪过。俞文称，“工宣队对井冈山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打击，与校文革在武斗中对那些同样的‘反革命集团’的打击毫无二致”，由此指责工、军宣传队站在聂元梓一边，笔者认为，这样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事实是明摆在那里的，谁也不能无视。

牛辉林等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情，是连毛泽东都知道的。毛泽东 7.28 召见“五大领袖”时，还为牛辉林说了情，说是在小屋子里说的话就算了。毛泽东虽然说了不要追究，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小屋子里说的话”是客观存在，并非别人诬陷。领袖虽然宽宏大量，宣传队却不能真的不追究。真的不追究，一风吹，要到迟群、谢静宜控制北大以后才能实行。

迟群、谢静宜率领的 8341 部队指责 63 军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 1968 年 10 月至次年 2 月的“清队”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末，他们自己领导的“清队”又如何呢？

1969 年 9 月 4 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是这样写的：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工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¹

¹ 水陆洲：《文革简论》第三篇第一章第三节“清理阶级队伍”，六十年代网，WWW.60nd.org/Article_print.asp?

这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取得的“成绩”。

从1970年起，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一运动持续时间之长，牵连范围之广，堪称历史之最。迟群、谢静宜及8341的军宣队不是指责63军军宣队领导的“清队”扩大化，而扩大化的主要一条是整了学生吗？这一次，他们自己不也是整了学生吗？牛辉林不是在大会上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才过了关吗？

迟群、谢静宜一伙真正要下狠手追究和打击的，是聂、孙和新北大公社坚决反王、关、戚的那些人。有人对聂、孙挑头反对关锋、王力一事非常不满，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数年后借机“秋后算账”，大搞逼供信，颠倒黑白，把反对“五一六”的聂元梓、孙蓬一打成“五一六分子”，才算出了一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诚如是也。■

【评论】

答魏明、梁珊、陈子明、林爻先生

宫香政

内容提要：

1. 作者针对魏、梁、陈、林四位校友对“谁之过？”一文的异议，列举事实进一步阐明，由于王、关、戚及其亲信的挑动和陈伯达无中生有的蛊惑，造成北大师生政治大分裂，催生了井冈山兵团。

2. 关于北大“牛棚”的出现，以及周培源校长、季羨林大师、杨勋老师（及其弟弟杨炳章）、戴新民、崔雄昆在文革中的遭遇。

3. 关于北大武斗中公社一方情况的补充说明。

4. 作者本人文化革命的简历以及文革后的遭遇。

前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已五十周年了，文革十年对我们国家而言是一场大灾难，北大是一个重灾区。我是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也是受害者。“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为了吸取文革的教训，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所了解的史实，在《记忆》159期上发表了《谁之过——北京大学文革前和文革中政治大分裂原因初探》。该文发表后，魏明、梁珊、陈子明、林爻几位校友，他们分别在《记忆》164期和172期发表评论《北大文革中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兼评宫香政的文章“谁之过”》，他们不与我探讨我在文中所列举事实的真伪，论点是否正确，而是对我进行批判与声讨，要求我“揭露内幕”、进行“忏悔”、“洗涤自己被污损的灵魂”。

“来而不往非礼也”，真理越辩越明，事实越摆越清。下面我从将几个方面对魏、梁、陈、林四位先生的责问进行答复。

一、北大井冈山兵团与王、关、戚毫无关系吗？

魏、梁二位写到：宫香政的文章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则完全是信口雌黄，毫无根据。“井冈山”兵团与王、关、戚毫无关系，没有得到他们任何指示和支持。

陈、林二位则说井冈山的成立与王、关、戚“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

《牛辉林之流就是林杰反党集团的马前卒》¹一文（图1），列举了三十九个例证。

1967年7月11日学部李惠国传达林杰、林聿时、周景芳的指示，要求“反对派联合

¹ 见1967年12月6日出版的《新北大》。

起来，否则的话，聂、孙会把你们吃掉”。王恩宇又做了四点指示：“1、你们要联合起来，不要争名称，要求同存异；2、要让周培源当一把手，理由是小将容易被打成反革命，而周培源可以与‘老佛爷’对抗，使组织不易被搞垮；3、对聂元梓的问题要注意，不要无限上纲；4、要准备长期斗争”。8月17日，井冈山兵团正是按这些指示成立的。

王、关、戚倒台后，井冈山内部人员质问牛辉林：为什么上了王、关、戚的贼船？牛辉林辩解说，是他们找的我，我对他们不了解。

井冈山兵团飘红旗战斗队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见附图）：

至于我们井冈山的一些负责同志，的确同当时披着群众组织负责人外衣的洪涛、刘郢、王恩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这如同当时同其他许多群众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见过面、谈过话一样普通又寻常，光明且正大。固然没有能够及时识破王恩宇、洪涛的反革命面目是严重的错误。对这一错误，我们兵团的负责人早已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

注意，这份传单是铅印的，证明是井冈山兵团高层的看法。尽管百般掩饰，还是承认“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是严重的错误”。而魏明、梁珊、陈子明、林爻 连这也不

承认。



1967年9月中旬，井冈山的领导人之一侯汉清曾对胡宗式说：看来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

清查5.16期间，1971年3月2日，牛辉林在宣传队组织的全校坦白大会上（在办公楼礼堂）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三宗罪：一是在5.16反革命集团的指使下，在北大策划武斗；二是洪

涛发展他加入5.16。他说：“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宣传队。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赶快坦白交待把。”三是说了一些江青的坏话。

需要指出的是：北大根本没有5.16，牛辉林也不是5.16，牛辉林的一位战友坦白交待

说，牛辉林发展他加入 5.16，也是假的。他们为高压所迫，违心地这样做是迟群们导演的政治丑剧。

1967年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聂元梓和北大公社持较保守的态度；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向中央文革告“王力、关锋结党营私”的状；4月12日孙蓬一发表讲话指出吴传启们是“摘桃派”；4月13日因对谢富治关于北大与地质的矛盾处理不公而引发的炮打谢富治；5月份聂元梓带领许多单位向吴传启们开战；造成王力、关锋很被动，中央文革也很被动，（井冈山把它视作“聂、孙分裂中央文革”一条罪状）。为了给王、关解围，为了给中央文革解围，打压北大，陈伯达抛出了“6.5讲话”，他说聂元梓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结果引发了北大的大乱，才有井冈山兵团的产生。

二、关于“牛棚”和干部政策问题

“牛棚”的本意是关押牛鬼蛇神的棚子。文化革命中，在全国各地各单位都设有“牛棚”，是个普遍现象（用今天的话叫做“私设公堂”、“非法拘禁”，绝对是错误的）。只不过是因国学大师季羨林老先生写了一篇“牛棚杂忆”，使北大的“牛棚”更加闻名于世。

北大的“牛棚”的真名是“监改大院”。据我所知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聂元梓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这些被群众冲击的干部（包括陆平、彭珮云）、教授、讲师，在工作组时期已经集中监禁，被群众称为‘黑帮大院’、‘监改大院’，并出现打人、骂人的严重违反政策的情况，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不就是这样死的吗？校文革成立后，这些被监管的人员，经王任重批准，从工作组接收过来”。

我所了解的另一个版本是：工作组在校期间对被揪斗人员，采取各系分散管理，只有像陆平这一类的人采取集中管理。当时情况非常乱，本系可以揪斗，跨系也可以揪斗，因北大反动学术权威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所以外单位也来揪斗，例如：冯友兰等都被外

单位揪斗过，甚至，外地来北大串联的红卫兵也揪斗过北大的“黑帮”。

校文革成立后，校文革副主任白晨曦（老干部）针对这一乱象，提出建议，将被揪出的干部、教师集中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随便揪斗，要批判需经讨论，并经校文革批准，与会同志（包括后来上了井冈山的同志）一致同意集中监管，称作“监改大院”（当时大多数人晚上回家去住）。校文革又规定不准打骂、不准逼供信、不准侮辱人格。

关进“监改大院”对被揪斗人员的是一种非法迫害；但集中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减少了对被揪斗干部的冲击，我想是有些许道理的，当年，郝斌老师是因为“迫害共和国第一公主”被揪出来的，如果不被集中管理，校外任何一个单位，会有一万个理由随时来北大揪斗郝斌老师的，那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实施监管的主要力量是红卫兵。在被“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裂行动”、“对阶级敌人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理论洗脑后，个人出于某种原因或冲动，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打骂或体罚是绝对错误的，但在那种无政府主义疯狂泛滥的形势下，聂元梓是控制不了的。她的错误就是管理不善、管理不到位。

魏、梁文中列举了54名受冲击、被迫害干部、教师的名单，是从校文革主办的校刊“新北大”上摘录的。在这里，魏、梁二位以代表这些受冲击、被迫害的干部、教师的身份指责控诉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罪行，不明真相的读者会误认为是聂元梓将这些干部、教师揪出来的，并把他（她）们关进“牛棚”，对他们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与迫害。

但是，魏、梁二位有意回避井冈山兵团在文革中是如何对待北大的干部教师的。据我所知，自井冈山成立以后，在他们的刊物“新北大报”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声讨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保护陆平黑帮”，连自己的同学也不放过。1967年10月16日发表了“杨绍明之流休想翻天”，1967年11月7日发表了“聂元梓纵容北大的老保翻天”，1968年1月6日又发表了“把聂氏大红伞下的王八统统揪出来（二）”，井冈山所点名要揪斗、批判的干部、教师、学生不仅在魏、梁所列的名单里有，而且远远超过54名。

我认为，聂元梓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同事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陆平一派政治

势力，毛主席给予了支持，使陆平一派的主要干部和教师受到冲击、迫害，聂元梓确实有错误。但是，也不要忘记陆平校长在执掌北大时，在上峰的高压下，推行“极左路线”时，曾伤害了一大批干部、教师和学生，其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死于非命。

至于北大文革中数百多位受冲击、被迫害的干部教师（包括被迫害致死的）的责任是否都应由聂元梓来承担呢？应该根据事实去分析评判。

根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后，发动群众打倒“陆平黑帮”，从6月1日至6月26日，揪斗了230名干部、教师，并自杀多名；1966年9月12日校文革成立后，校文革接手管理后是218名，（也有个别人被逼自杀）；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后，共挖出敌我矛盾性质的542人（自杀多名）。

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组织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十万人批判陆平时，规定不准给他挂牌子、不准戴高帽，让他坐着、允许他回答问题。原以为这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批斗会，中央文革会登报宣传，结果不仅没登报，反而受到江青的批评，说聂元梓“温良恭俭让”太“温”了，也受到校内反对派的批评，我想你们不会忘记吧。

魏、梁说聂元梓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但是，当校文革要解放干部时，却受到一些极左人物的阻挠，包括井冈山的一些人。井冈山兵团“众志成城”战斗队在《不许聂元梓与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唱反调——北大干部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¹一文中写到：

……孙蓬一竟然明确宣布“除了报上点名的（即陆平、彭珮云等），其余的干部都可以解放……聂元梓们早就为老保翻天首先打开了大门。

在魏、梁、陈、林及一些井冈山校友文章中，总把周培源校长、季羨林老先生的弃聂上山和杨勋老师被迫害事件拿出了说事，其意图有二：

一是因为周培源校长、季羨林老先生、杨勋老师他们是有影响的正面人物，他们参加了“井冈山”就说明“井冈山”是正确的，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毫

¹载于《新北大报》1967年11月30日

无说服力的“臆想”。只能对不了解北大文革内情的读者造成一定的误导；

二是：把他（她）们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与迫害，说成是聂元梓加害了他们，所以聂元梓罪恶滔天。更有一位井冈山校友则把聂元梓称作“乱世魔女”。而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1. 周培源

周培源校长与聂元梓曾是反对“陆平黑帮”的战友，文革开始时他是支持聂元梓的。

在《记忆》172期陈子明、林爻文章中写道：1966年12月14日，校文革整风时，周校长曾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致聂元梓同志及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公开贴在29楼北墙上，忠言谏论，对校文革主任聂元梓提出了善意和中肯的批评。在这张大字报中周培源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工作中的表现，以及对待群众的不同态度，提出了自己一些真诚而温和的意见，以善良的愿望，希望聂元梓与校文革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十六条”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办事。在这张大字报中周培源还十分可贵地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明确提到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人，“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应该让群众提出材料，深入辩论，做出结论。如果群众认为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那么就应该解放他们，对他们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让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斗争黑帮”陈、林二位又写到：聂元梓此时正是上升的政治巨星，逆耳之言，触怒了这个风头一时、头脑急剧膨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燕园霸王，所以，周培源又被她急急忙忙遣往汉中分校主持工作。聂元梓拒谏饰非，失人心。

周校长在公开信中，对校文革主任聂元梓提出了意见是善意和中肯的，也是真诚而温和的，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但是，陈、林二位在文中没有列举出一件事实，证明“聂元梓拒谏饰非”，这让读者大感困惑。

1967年3月27日，周培源校长还发表讲话坚决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他说，1966

年12月间，我离开北京去653工地时，曾给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常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向常委提了意见，要求他们开门整风，以便领导好两条路线的辩论。当时正碰到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猖狂反扑。这时公开信被阶级敌人利用，来围攻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长了资产阶级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所以起了很坏的作用。我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给运动带来了损失，心情十分沉痛……去年九月底，校文革常委为653工地的文化大革命开了一次会议，我列席了会议。当时聂元梓同志因病住院，会议是由孔繁主持的。在这次会上，我感到校文革常委组织很松懈，领导不力。当时我对校文革的常委同志们支持653工地的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很急，由于他们的工作比较繁重，一时照顾不过来，而且工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依靠广大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我自己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我就主观地认为校文革常委对当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653工地文化大革命不够关心，而感到很不满意。

北大的汉中653分校，是战备需要的产物，是周校长一手指导建立起来的，凝聚着老校长的心血。校文革安排他分管653分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谈不上陈、林所说，周培源又被她急急忙忙遣往汉中分校主持工作。更谈不上在魏、梁二位所说周培源的上山是“遭到聂元梓的冷遇和排斥”。如果像你们所说，请你们拿出实证材料来。

1967年4月他向校文革提出要求，希望派一位年轻教师去分校，帮助他工作，校文革就派高云鹏去汉中。校文革指示高云鹏：汉中分校的师生不要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一律返校参加文化革命。在高老师的动员下，大多数师生返回北京，只留少数同学护校。高云鹏老师亲自对我说，67年5月底，周校长对高老师说，汉中有“放射源”，一旦出事将酿成重大安全事故，我认识杨成武，我回趟北京，找杨成武帮助解决一下，十天半月就回来。

周校长回京后，听到陈伯达的“6.5”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是一枚重磅炸弹。在“大是大非”面前，周校长站到了反聂阵线无可厚非，但他老人家冷不丁的就当上了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这正是受王、关操纵的杰作。

陈、林在文中提出质疑说，你宫香政又在什么场合，怎样安排。。。。。。周培源校长听陈伯达的讲话的？这纯粹是废话，请问二位先生，陈伯达‘6.5’讲话，凡是当时的北大人，人人皆知，北京市高校也人人皆知，二位在这里纠缠周校长是如何听到陈伯达讲话，是毫无意义的。

周培源是校文革要结合的干部。在他上山以后。公社方面对他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是派性在作怪。

周校长参加井冈山后，上层很重视，周总理亲自找周培源谈话，劝他退出井冈山，他很快就辞掉了一把手，退出了井冈山。

2. 季羨林

季羨林是著名的教授，对国家的文化建设与传承，有过重大贡献。季老先生在北大社教初期是积极分子，文革初期没有受到冲击。陈伯达“6.5”讲话后，他认清了形势，弃聂上山，并成为东语系井冈山纵队的勤务员（红卫兵的负责人）。他在《牛棚杂忆》中说自己从来不说假话，把自己打扮成一位道德家，却要求在文革中批判过他的人，无论是公社还是井冈山，无论是同事还是他的弟子，都要向他道歉。但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却轻描淡写，他说：“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的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¹他竟忘了自己是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负责人。

他讲自己上山的理由，是因为“……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请记住，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之死发生在1968年4月19日，季老先生上山是1967年7月，老先生上山在先，温家驹被刺在后，时间相差9个月，这种理由编造是明显的假

¹《牛棚杂忆》第55页

话。

公社方面出于派性，抄了季先生的家。抄出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他在文革期间还写了“待死斋札记”，他羡慕浮在水面上晒太阳的王八，一旦听到人的脚步声，立刻沉到水底，他想做一只沉到水底的王八。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你老先生却保留着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毛主席说，北大“池深王八多”，要打破“北大这个反动堡垒”，季老先生却要做一个会沉底的王八。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红卫兵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背景下，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季老先生在《牛棚杂忆》有这样的记载。

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¹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²

今天来看，季老先生这两件事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那是重大

¹《牛棚杂忆》第69~70页

²季羡林：《牛棚杂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69—70页。

的政治问题。所以说并不是聂元梓授意揪斗了他，也不是聂元梓把他关进了“牛棚”，而是文化大革命把季老先生送进了“牛棚”。

3. 杨勋、杨炳章

北大文革中的“杨勋事件”，在一些人的印象里（包括我本人）好像是聂元梓迫害了杨勋老师。聂元梓与杨勋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吗？为什么要迫害她？这是人们所关注的。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的老师，她有个弟弟叫杨炳章，是个非常好学的青年。他不是北大的学生，想学习经济学，在北大经济系旁听，是聂元梓批准的。杨勋的回忆文章提到这一点。杨勋姐弟是烈士子弟。从杨勋老师的回忆录里，看不出她与聂元梓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说看不上聂元梓的人品。在北大社教中杨勋也是积极分子，与聂元梓站在同一阵线。

1966年7月25日，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大讲自己家里的阶级斗争。杨炳章对江青很有看法，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建议信”，其内容大致是，不能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并说，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将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等。7月26日，杨炳章要求杨勋老师陪他一起去国务院接待站（在中南海旁边），求见毛主席，要亲自递送“建议信”，杨勋老师陪他去了。后来，戚本禹带他们去钓鱼台，江青接见了他们姐弟二人。在江青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把“建议信”亲手交到了江青手里，这就埋下了祸根。7月26日晚，在大操场举行万人大会时，江青第一个叫号，让杨勋发言，杨勋没有理睬，躲过了一劫。

杨炳章当时住在北大19楼。在大饭厅，他与北大红卫兵就伊林、涤西的给林彪的一封信，进行了辩论。他支持伊林、涤西的观点。而当时普遍认为这封信是反林彪的，是“十二月黑风”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红卫兵（牛辉林为首，当时是支持校文革的）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扭送公安机关。尔后又抄了他的家，抄到一个笔记本。

杨炳章是一位有独立思考精神之人，他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红旗杂志第十三期评论员文章发表后（杨勋说是十五期社论），杨炳章在笔记本里，

针锋相对进行了批驳，其语言之犀利，据说带有鲁迅的风格。杨炳章上述表现和笔记中的论调，触动了上峰的大脑神经，据传有位大人物说：“杨勋起码是窝主”。周总理就通知康生，命令聂元梓派人将杨勋扭送公安部。当时聂元梓及派去扭送杨勋的同学都蒙在鼓里，都不知道杨勋老师犯了什么罪，只是听命而行。1966年8月杨勋对于北大文革的看法与聂元梓不同，曾写过一系列大字报，但这种分歧构不成送杨勋去公安部的理由。杨勋老师在监狱里受到长达两年多的虐待，期间，曾数次被揪回北大进行批斗。原来支持杨勋老师的师生也上台批判她与她划清政治界限。

今天，我们冷静分析，杨炳章的观点是对的，动机也是好的。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杨炳章公然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唱反调；江青是毛主席所信任的人，又是被林副统帅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你不让“旗手”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红卫兵把他视为“现行反革命”是符合当时的政治气氛的。在“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谁反对江青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的政治气氛下，当你接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命令时，我想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勋老师扭送公安部的。要追究聂元梓迫害杨勋老师的责任，只能按从犯的“N次方”来对待。诚如聂元梓在回忆录里说：“我替周总理背了黑锅”。

4. 戴新民

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她原在国家计委工作，行政九级，后来受“第一个五年计划”泄密事件牵连降了两级），井冈山方面揪斗她，并将她关押长达七、八个月之久，使戴新民变成了“白毛女”。宣传队进校后，新北大公社的卢平和我等人去28楼，与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商谈大联合问题，恰巧遇到戴新民，她刚从28楼被放出来，只见她满头白发、面无血色、脸瘦的脱了相，刚见到阳光，两眼眯成一条缝，走起路来直打晃，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见到真正的“白毛女”。

5. 崔雄昆

崔雄昆原是北大教务长，是校文革结合的干部。井冈山方面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陆平的黑干将、党内走资派、三反分子、迫害林副统帅等等），抓捕、揪斗了他。

“迫害林副统帅”是井冈山扣在崔雄昆头上的一大罪状。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林立衡是64年春天到北大中文系来学习的。林立衡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休息。按北大当时的规定，病休时间过长应当办理休学。当林立衡请病假“超过四周多一点”的时候，（叶群给北大写信要求让林立衡继续在北大学习，不要安休学对待），中文系打报告向崔雄昆请示处理办法。在中文系的报告上，崔雄昆批示：“我意按规定办事，该休学就通知休学，否则对本人也不好！”，陆平校长批示：“应按规定办事。”这就成了陆平、崔雄昆两位“黑帮”疯狂迫害林副统帅的滔天大罪。

在1967年底，井冈山方面抓捕崔雄昆，进行审问，后在北京卫戍区的干预下，崔雄昆才被释放。1968年8月宣传队进入北大，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开展清查陆平黑班底运动，大批干部自杀，崔雄昆于1968年10月16日投湖自杀。

三、关于武斗

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已在《记忆》182期中详细叙述了它的发生、发展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我倒希望健在的井冈山负责人，也能将自己经历的武斗过程真实情况写出来，以使北大武斗这一历史事件的脉络从多个角度更加完整。

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艾群先生在文中讲，公社给井冈山断水、断电、断粮、断炊，是不确切的。间断地给井冈山断电确有其事，为的是不让井冈山的喇叭叫；断粮、断炊不存在，大饭厅一直向两派开放，只不过是少数井冈山的成员不敢到大饭厅就餐，怕被公社抓，若真正断粮、断炊，几千人的井冈山得死多少人？断水更不可能，人离开水活不过三天，

这是起码的常识。如果公社方面真的给井冈山断了水，那么井冈山的同学唯一的出路就是撤出北大。新北大公社是不会那样狠心的。

另外，在“3.28—3.29”武斗中，公社一方没有发放黄色军棉袄，白毛巾发了一些，不够的用白布条代替。

四、我的遭遇

魏、梁文中说：“宫香政作为聂元梓在武斗中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指挥武斗，造成三名无辜群众死亡，数百名群众受伤，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影响非常恶劣”，并要求我“揭露内幕”、进行“忏悔”、“洗涤被污损的灵魂”。

魏、梁文中给我罗列这些罪名，并不陌生，因为这些罪名正是当初迟群、谢静宜网罗罪证，整聂元梓和孙蓬一材料的一部分，并在1971年至1975年发到河北用来抓我“5.16”的材料，1982年北大党委又沿用了这些材料，并发到河北省组织部，用来抓我“三种人”。

下面我可以向魏、梁二位披露一下我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个人经历的“内幕”。

我与同学徒步长征后，于1967年春返回学校。尔后，参加了“新北大公社”。陈伯达“6.5”讲话后，我参加了“6.6”串联会，仍然留在“新北大公社”，并被推举为红十七团负责人之一。

要问我为什么要支持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毛主席支持聂元梓，我就要支持她。陈伯达的讲话是无中生有，事实也证明陈伯达“6.5”讲话是错误的。

1967年底1968年初，校内两派斗争加剧，公社一把手孙月才被打伤，高年级同学忙于毕业分配，公社总部缺少人手，在战斗团长联席会议上，经大家推举，我与无线电系的黄树田、历史系的丁建华进入公社总部工作。在总部我负责宣传工作。

当时，中央文革“见聂必批”，公社的压力很大，为了加强凝聚力，公社举办了“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是负责人之一。

1968年春，市革委会批聂元梓、江青批孙蓬一。校内、校外掀起了“打到孙蓬一”、“聂元梓滚出市革委会”、“一切权力归井冈山”的浪潮，地派院校不断派人到北大示威游行，校内“井冈山”通缉孙蓬一，到孙蓬一家里抓捕孙蓬一，吓坏了他年迈的岳母和年幼的孩子。在校内围攻、殴打孙蓬一，后被公社的同学解了围。“井冈山”冲会场、武力摘喇叭，之前，还砸了“二组”，揪斗殴打了谢甲林同志，公社的同学也打伤了井冈山负责人侯汉清。如此等等，校内小规模冲突不断，武斗的气氛越来越浓。面对这种形势，公社总部开会商量，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应该有所准备，决定将二期学习班的男同志集中在“第二体育馆”住宿、学习，并让孙蓬一住进二体，予以保护。

随着校内外对新北大公社和校文革围剿的加剧，北大校内武斗气氛越来越浓，公社总部在1968年3月22日，开会决定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经会议分工，指挥部成员由我、黄树田、黄元庄三人组成。并且提出“绝不先打第一枪”的原则。

“自古知兵非好战”，有谁生来就好打架的？在公社几千名师生面临巨大压力下，我作为总部负责人之一，必须勇于负起这一责任，才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在北大武斗期间，我只参加了“3.28-3.29”武斗的研究和指挥，“3.29”之后，我一直驻守31楼，所以其余两派的冲突我均没有参与，连两派交换“俘虏”的事，我都没参与。

武斗间歇期间，公社个别人抓人、打人，致死三人（温家驹、刘伟、殷文杰），与我毫无关系。我在办公楼大会上曾抨击说：“优待俘虏是我们党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优良传统；战场上不能冲锋陷阵，而抓了对方的人却往死里打，这不是英雄行为”。

回顾我在北大文革中的行动，参与指挥武斗是错误的，对不起两派校友。但自我安慰的是：我没有上台批斗过“陆平黑帮”；我没有揪斗过老师；我没有诬蔑、迫害过同学；我没有策划、指使、或授意下属去抓捕井冈山的任何人。唯一感到内疚和自责的是：我对不起北大的校友（我中学的师弟）井冈山化二的袁克强同学，“3.28”之后他找到我，希望进入31楼取出自己的行李和用品，我没有同意，因为公社一些同学的个人用品在井冈山占据的楼里也取不出来。事后，我想起这件事心里就难受，觉得很对不起袁克强，在这里

借用此文公开向袁克强表示真诚的歉意。

毕业后，我在廊坊一个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1年春，正在北大掌权的迟群将诬蔑我的所谓“罪证”材料（像魏、梁文中所写的那样）发到廊坊地区革委会，企图把我定为“5.16”反革命分子。组织部门多次派人去北大核实我的“罪证”材料，均空手而回，只有一点是，对两派武斗中所造成人员受伤，我应负部分责任。从1971年至1975年抓了我五年“5.16”。结果，由于证据不足，最后，不了了之。

邓小平上台后，清查“三种人”，当时王学珍、郝斌在北大当权，他们不负责任地沿用了当年迟群、谢静宜所罗列、强加在我头上的“罪证材料”（正像魏、梁二位所写的那样）发往河北省组织部，河北省把我看成“一条大鲨鱼”，作为典型案例，要把我定为“三种人”。我回校找到了王学珍、郝斌以及校党委纪检委副书记陆嘉玉（据说此人曾是井冈山俄语系的负责人之一），进行申诉。他们听了我的申诉后，就派了陆嘉玉和当时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李玉英同志去了廊坊地委组织部，他们向廊坊的同志表态说，宫香政在北大定不上“三种人”，廊坊的同志要求他们留下文字意见，他们不写，说什么“我们不能干涉地方党委的工作”。河北省面对北大党委发来的材料和我个人的申诉，他们相信谁呢？当然，相信的是北大党委的材料，即使我长一百张嘴，也说服不了他们，就这样我被强行定为“三种人”，并被清除出党。这是我人生中所遭受的最大打击。

对我的遭遇，王学珍、郝斌、陆嘉玉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在我被审查期间，节、假日，不给我开介绍信购买火车票，不准我回京探望老人和孩子。被定为“三种人”后，更是影响了我长工资、分房子、评职称，孩子高考的政审，直到1995年我才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我被定为“三种人”后，廊坊工业局副局长李同志对此很惋惜。他说，57年我保护了一位知识分子，这次没保住。廊坊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魏同志也表示后悔把我定为“三种人”。

结束语

抛弃派性，回归确良 理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写好北大文革历史，是我们这些亲历北大文革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结束 40 多年了，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够理性的看待这段历史。

我认为，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

要写好历史，必须树立历史责任感，抛弃派性，回归理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写好每一个历史事件，才能问心无愧的面对广大校友，无愧于读者和后人。

我反对在书写北大文革史时，不从历史事实出发，甚至歪曲或违背历史事实，而带着派性情绪空喊口号、谩骂对方的做法；

更反对移花接木、胡编乱造、信口开河、把自己虚构的罪名强加给对方的卑劣文风；我鄙视那种企图通过书写北大文革史，把自己打扮成抵制文化大革命、一贯正确是“代表正义”的虚伪做法。

更有甚者把北大文革史说成是“保聂与反聂的斗争史”，更是狭隘和可笑的。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文革中北大的两派？我认为我们都是被利用的工具（红卫兵）。想当初，我们是信仰同一个理论、崇拜同一个偶像、跟随同一个领袖，去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有不同看法，才分成两派的。两派斗争决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我赞赏俞小平校友，他是位善良的人，他提出了一个让人们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做人的底线哪里去了？”。

文革前，在北大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同学之间真诚友好相处，那种友谊是不参水的。

文革中，有的家庭，夫妻反目、父子决裂，亲情没了；在同一单位里，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往日的友情没了。这是为什么？是人们突然间变坏了吗？不，我认为不是突然变坏了，而是人们被洗脑了，“做人的底线”这座堤坝被“亲不亲阶级分”和“路线斗争是国

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是你死我活的，是不可调和的”这些理论洪水冲垮了。

以上，就是我对魏、梁、陈、林几位先生文章的答复。

最后，我希望知道你们的真名实姓。因为书写历史，应该真名实姓，书写历史需要“终身负责制”。如果采用假名，书写假史，欺骗读者，误导后人，而自己却隐姓埋名，不负责任，这种沽名钓誉的投机行为，是绝对不可取的。

我还要向诸位先生申明：

1、你们如果认为我所列举的历史事实有误，可以与我讨论，如果我写错了，我可以发表声明予以修正；

2、如果你们认可我所写的历史事实，而在派性驱使下与我争论，我告诉诸位先生：派性是绑架理性的枷锁，站在派性的角度去争论问题，永远达不到“理性的统一”；

3、书写北大文革历史，采取矢口否认事实，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同时也会损害你们自身的声誉。■

2017.6

附：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宣言

历史在前进，革命在飞跃，造反有理的战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大学的上空！

我们——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新北大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五个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中，在北京大学两种命运的决战关头，在毛主席为我们亲笔题字一周年的纪念日子里，胜利会师了！我们联合起来了！我们庄严宣告：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了！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这是新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世界革命的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最高红司令。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副统帅。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大喊大叫，奋斗终身誓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新北大，插遍北京城，插遍全中国，插遍全世界！

光焰无际的四卷雄文，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最锐利的武器，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是我们乘胜前进的理论、方针、路线和政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最高参谋部，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我们坚决拥护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坚决拥护她的正确领导！

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这些落水之狗，僵而未死的毒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陆平、彭佩云黑帮把持下的旧北大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顽固据点，我们要奋起千钧棒，砸烂旧北大，把北大建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堡垒！

张承先反革命工作组，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及其死党王任重是镇压和破坏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彻底清算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

我们新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在与彭真、陆平黑帮的搏斗中，在与张承先反革命工作组的搏斗中，在与刘邓黑司令部的搏斗中冲杀出来的！

我们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坚决

依靠群众，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干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国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我们和他们心连心。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永远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为在北京大学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实践革命的“三结合”而努力奋斗，为在北京市促进革命派大联合而贡献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场革命的大批判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革命的大批判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原则。我们誓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这是何等辉煌的战斗篇章，何等壮丽的伟大事业，何等重大的历史任务！

但是，革命的航道不平静，进军的路途多坎坷，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前进的脚步遇到了障碍。

新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老同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由过去受压制的地位，变成当权的地位，由于他们不注意夺自己头脑中的“私”字的权，保存并发展了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因而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重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们把新北大公社作为他们执行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

他们抵制在新北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搞独立王国，鼓吹“反聂即反动”的反动理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他们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动摇北京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

他们在校内外，扶植保守派，打击围攻革命造反派，挑起北京市两大派斗争；

他们在运动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提出错误的理论和荒谬的口号，什么“上揪下扫”，

“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十七年的掌权经验不能用了”，“大抓摘桃派”等等，转移斗争大方向，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是可忍，孰不可忍？！

新北大的革命派怒吼了：“还我新北大！还我新北大！”

今天，在欢庆毛主席为北大亲笔题字一周年的庄严时刻里，我们披着鏖战沙场的风尘，怀着横扫千军的豪情，我们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会师了！联合起来了！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

我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同甘苦，共患难，实现了革命派的大联合，必然带动和促进全校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也必将进一步推动革命大批判运动保证其胜利进行。

井冈山兵团的战士们，我们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必须在大批判的战斗中狠夺头脑中“私”字的权，在头脑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警惕阶级敌人“和平演变”的阴谋，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永葆革命之青春，永不变质，永远革命。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一泻千里，不可抗御！

试看来日之环球，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试看来日之北大，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北大！

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陆平、彭佩云！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述往】

刘冰在清华“渣滓洞”十个月

刘冰原文，胡鹏池改写

改写者按：

2017年7月24日，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兰州大学原校长刘冰因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6岁。

2017年7月30日上午，刘冰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近千人参加了刘冰遗体送别仪式，习近平等七常委，胡锦涛等退休老常委赠送花圈表示哀悼。可以说刘冰老人的逝世备极哀荣。

我于1962至1968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时，刘冰一直是党委第一副书记，曾多次听过他的报告。记得1965年9月当我们即将下乡参加四清时，他在大礼堂给我们做报告，在谈到处理工作队内部的人际关系时说：感觉上敏锐些，感情上粗糙些。两句话使我受益非浅，铭记至今。

1998年年初，当他的书《风雨岁月》初版时，我曾得到过他的签名书。

有感于刘冰前辈在文革中遭受到极端极左造反派的迫害，前几年我曾根据《风雨岁月》中的有关章节改写成《刘冰在清华“渣滓洞”十个月》一文，其内容均出自原书，只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另外还整理了一张时间表。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应该愤怒的事情而不发怒的人，我们只能以愚人视之”。（《伦理学》）写史者不是木头人，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对是非善恶表达正常人应有的愤怒与热情，这不仅仅是权利，而且是责任，还是作品之价值。

刘冰在清华“渣滓洞”的时间表

文化大革命中，原清华大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刘冰被团派专案组秘密关押、残酷迫害10个月，关押地点先后换了六处。兹将其时间排序如下：

- ① 甲所七个月 1967年10月下旬——68年5月30日；
- ② 旧水三天 1968年5月30日——6月2日；
- ③ 生物馆一个半月 6月2日——7月19日；
- ④ 200号八天 7月20日左右——7月28日；
- ⑤ 北航七、八天 7月28日——8月4日；
- ⑥ 生物馆地下室五天 8月5日——8月9日；

1968年8月9日下午，刘冰被工宣队释放。估计其正负误差为1至2天。

一、甲所，七个月

196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校医院的一个团派头头要刘冰带着行李跟他到甲所。甲所有前后两排，中间有个院子，原是校党委几位书记的办公室，文革中早已被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所占领，这时是团派工人组织“革战团”的办公地点。校医院的这个团派头头将刘冰引进后院，顺手推开了一间房门说：“刘冰，你把东西放在房里，从现在起，你就住在这里，吃饭由你家里送，听候我们的通知，就这样。”然后，他将房门一关，锁起来就走了。

刘冰在房内急着喊：“你们要我来干什么？怎么能不说明原因就把我锁在房里？”

“你以后就会知道的。”头头在门外边走边回答。

院子里就再也没有声音了，刘冰看看表，这时是下午4点半钟。

自从1938年参加革命，刘冰的革命生涯已经有29年，还有一年就是30年。刘冰革命

的“三十而立”，“立”在了蒯大富的“渣滓洞”。

这是刘冰平生第一次被当作犯人关起来，平生第一次失去自由，他在房间里“热锅上蚂蚁”般地来回踱步，心想：蒯大富多次讲要“把刘冰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果真“是祸躲不过”，眼前的被囚禁大概就是这种说法的效验了！

天色渐渐黑下来，刘冰打开了电灯，光线微弱，灯泡大概 25 瓦。刘冰察看房间各处，窗子被木条钉了起来，房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条桌、一个凳子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刘冰心想，看来他们可能要把我长期关在这里。

7 点钟左右，那个头头把房门打开，一位工人师傅一同走进房里来。

头头说：“刘冰，以后由这位工人师傅负责看管你，负责给你送饭，上厕所由他给你开门。”头头说罢就退出房间溜走了。

这位师傅手里提了一个饭盒说：“这是你家里给你送的晚饭，吃完后我来把饭盒取走。”

刘冰说：“我想见见家里人。既然把我关在这里，我得告诉家里，让他们放心，再说还需要给我送来换洗的内衣。”

师傅说：“要见面，那恐怕不行，要衣服你写个条。”看样子，这位师傅在派来前已经被交待“规矩”了。

刘冰找出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我可能短时间不能回家，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

师傅说：“不能这样写，只写送来换洗的衣服。”

刘冰把前面半句话划掉，下面写上名字。

师傅说：“勾了不行，划几道，字还看得清楚呀！”

刘冰问：“你们是不是怕我家里人知道把我关起来了？”

师傅难为情地说：“是又怎么样？你就别问了！”

刘冰想，问他也没用。于是从本子上又撕下一页纸写上：“先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以后需要什么再说。”

刘冰想，还是得让家里知道自己短时间回不去。师傅拿去纸条往外走，砰的一声把房

门关上，锁住了。刘冰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心中想：这也是一场斗争啊！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用什么“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刘冰称这是一场“切断与反切断”与外界联系的斗争。

刘冰刚打开饭盒准备吃饭，就听到外面有人来了，放下饭盒，门已被打开。

头头凶相毕露地站在门口嚷嚷道：“刘冰你老实点，你做什么手脚？你写的纸条不行，要重新写！”

刘冰什么话也没有说，接过纸条用劲撕碎，撒在地上，从本子上又扯了一页纸写上：“我需要换洗的衣服，多送几件来。”之所以加上“多送几件来”，仍然是想表达短时间回不去的意思。

头头没等刘冰签名，顺手抓去纸条就撕了。他说：“你就写‘给我送换洗衣服’，一个字也不准多写。”

刘冰说：“不必写了，请你们到家里帮我拿来就是了。”刘冰想，如果他们去了，家里人必然要问明原因，才会交给衣服，这样就逼着他们非说不可。

头头不干，非要刘冰写，刘冰坚持不写。头头发火了，大骂刘冰“不老实”，“无事生非”。刘冰心想，也不知谁在无事生非？这年头和谁讲理去！刘冰以沉默来对抗，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头头骂骂咧咧地走了。

夜里10点多钟，师傅将刘冰带到隔壁一间大房子里。房里灯光很亮，头头坐在办公桌的中间，两边各坐了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的衣着像复员军人（下文中我们就姑且称其为“复员军人”吧），他和头头你一言、我一语地要刘冰坐到房子正中间的一个凳子上，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被告席”。

头头说：“刘冰，你知道叫你来这里干什么吗？”

刘冰答：“你们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

复员军人说：“要审查你的历史。你懂吗？”

刘冰答：“我的历史1942年整风运动中早审查过了，用不着你们审查。”

头头说：“你的历史不清楚，需要我们审查。不行吗？”

刘冰答：“我是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干部，我的历史只能由中央组织部审查，你们没这个权力。”

头头猛然站起来，用拳头捶着桌子嚎叫着：“你放老实点，摆什么资格，你是走资派，是黑帮！”

刘冰回敬道：“你吓不倒我，我说的是事实。”

复员军人说：“算了算了，不跟他磨牙。刘冰你听着，从今天起，你在这里写材料，集中写你的历史，并且随时接受我们的提审。”

头头说：“好了，今晚就谈到这里，你回房间去，明天早饭后，就开始写材料，三天后再找你。”

刘冰回到房间已11点半钟，他把床铺整理好，躺在床上，思索着下午、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刘冰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他们是想从我的历史上制造一个什么东西，以达到打倒我的目的。这也就告诉我，他们要想从工作问题上打倒我，已经办不到。但是，他们在我的历史上要制造什么东西呢？

刘冰仔细回顾参加革命29年的历史，估计他们很可能要在“入党”问题上做文章。

刘冰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入党的经历：第一次是1938年6月在河南地下入党，7月经河南党组织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但党的关系直到同年10月还未转到抗大。同年10月间，在刘冰本人一再要求下，学校党组织劝他重新入党，等河南转来党组织关系时再计算那一段党龄，就这样，刘冰在延安重新入了党。到1939年春，中央组织部把河南转去的党组织关系材料转到刘冰当时所在的抗大一分校，这才接上了前一段党的关系。从这时起，在刘冰的履历表上，都据实写明了两次入党的情况，以及什么时候接上了第一次入党的关系。

刘冰反复思索，认为他们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因为当时正是康生、江青一伙指使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处掀“叛徒”的混乱形势。

刘冰心中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一直到凌晨4点钟才入睡。

早晨，还是那位师傅来送早饭，他把刘冰叫醒后，师傅批评刘冰睡懒觉。

早饭后，刘冰开始写自己的历史材料，尽量详细写了从出生到“文化大革命”45年的历史实情。

第三天上午，刘冰已将材料全部写完，下午又校对了一遍，吃晚饭时就把材料交给了师傅。送走了材料，刘冰有一种轻松感，自知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心里很坦然。但又想知道材料送去后“造反派”们如何动作？所以每天都盼着师傅带来的消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了仍然没有反应。刘冰待在房子里没有任何事情，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而书只有“毛选”和“语录”，为了消磨时间就背“语录”。

11月初的北京天气已经很冷了，这些天又来了寒流，室内温度急剧下降，晚上在被窝里不感到冷，白天在房子里看书就坐不住了，主要是手脚冷，刘冰只好盖上被子靠在床边的墙壁上看书。

送走材料的第十天夜里11点钟，刘冰已睡下，师傅开门将刘冰叫到隔壁房间去。还是那个大房间，还是原班人马，还是那个阵势，头头坐在办公桌的中间，得意洋洋，摇头晃脑。刘冰后来回忆说：他就像我少年时在家乡看到的国民党保长的模样。

头头说：“刘冰，这是第二次提审你，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你写的材料，我们详细看了，你的档案我们也看了。”

那位复员军人插嘴说：“告诉你，是谢富治副总理让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看了你的档案。”

头头继续说：“按党章规定，18岁才够入党年龄，而你刚过16岁；党章规定入党介绍人是两名正式党员，而你两次入党都只有一人介绍，这为什么？你要讲清楚。”

刘冰回答：“我入党年龄及介绍人，材料上都已写清楚了，就是这个情况，这是事实，我认为没有什么要说的。”

复员军人说：“我们是要你回答你的入党年龄和入党介绍人为什么不按党章规定？你明白吗？”

刘冰说：“我入党时没有看过党章，当然不知道多大年龄才能入党，也不知道入党要

有几个介绍人，但我想，入党介绍人他应当知道，党的上级组织更应当知道，为什么又批准我入党，这些都不是我应当和能够回答的，你们应去问我的介绍人和党的上级组织。”

头头站起来拍着桌子，提高嗓门说：“我们是问你，是要你回答！”

刘冰说：“我已经回答过了。”

头头怒目指着刘冰说：“你回答的是什么？”

刘冰说：“你们问的问题，第一我不知道，第二你们应该去问我的入党介绍人，问上级党组织。”猛然间，刘冰只觉得腰部疼痛，眼睛发黑。就在刚才对话时，那位复员军人连推带打，将刘冰打倒在地上。

复员军人骂道：“你混蛋！你是混到党里的假党员，你不承认，狡辩是不行的。”

刘冰挣扎着踉踉跄跄站起来说：“我向你们提出抗议，打人犯法。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说我是假党员，这是诬蔑。”

复员军人猛然用棍子在刘冰的脊背上乱打。

刘冰大声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脊骨，但打不掉我的党性！”“我如果承认是假党员，就是对党的背叛！”

刘冰用力地挺直了腰板呼喊：“你们打吧！要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假党员，简直是痴心妄想！”

咔嚓一声，棍子打断了，停下不打了。

头头装模作样地说：“算了算了，让他坐下。”

刘冰不坐，依然站着。

复员军人说：“不是让你坐下吗？”

刘冰说：“我不坐，站着好让你们打呀！”

房子里一阵沉默之后，头头说：“天晚了，今天审问就到这里。刘冰，你回房里老老实实地想你的问题。”

刘冰回到房间时是凌晨1点钟，脊背疼痛，辗转翻身，不能入睡。刘冰索性起来，在

房间内踱步，思索刚才的“提审会”。刘冰越想越感到他们色厉内荏，挖空心思，制造事端，下定决心要和他们较量下去。直至凌晨3点，刘冰想还不知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还是要爱护身体，抓紧睡觉。为了防止发生师傅开门进来还在睡觉的事，刘冰用凳子顶住房门，吃了两片安眠药，然后盖上被子，慢慢入睡了。

第二天下午，头头来问刘冰对头天晚上“提审会”提出的问题想了没有？

刘冰说：“想了。你们搞逼供信，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历来的政策，违反宪法。”

头头骂了一声“顽固不化”，就气呼呼地扭头走了。

从这以后20天的时间没人来问，也没再“提审”。

刘冰以为所谓“假党员”问题，可能不了了之了。但他这一次的估计完全错了。

12月初的一个夜晚，大约凌晨1点钟，头头带了几个把刘冰从梦中叫醒，先就在房间里劈头盖脑地打了一顿，然后带到甲所会议室“审问”。

头头对刘冰说，我们按你提供的线索，作了调查，无人证明你是党员，你必须交待“如何混入党内来的”？

刘冰说：“你们说我混入党内，是对我诬蔑，真的假不了，你们吓不倒我，还是那句话，要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假党员，是痴心妄想，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继续打吧！”

刘冰将双腿距离拉开了一些，挺直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着，作大义凛然状。

头头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既然不交待，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今天就‘审问’到这里。”说着，就让师傅将刘冰带走。

从这以后，刘冰时刻准备着他们的“审问”，但一直没有消息。

送走1967年，迎来了1968年，还是没有消息，两派武斗也越来越严重，刘冰以为所谓“假党员”问题，就这样拖下去了。

二、旧水，三天

1968年5月，学校里武斗升级了。“井冈山”派和“四一四”派分别占据了教学区各高层建筑，用长矛和其它自制武器相互厮杀。两派的广播台相互对骂，昼夜不停，特别是到了午夜，竞相加大音量，信誓旦旦宣示自己一派最正确、最忠于毛主席。当然，孰是孰非，群众自有公断，但国无法治，校无宁日，公断又有何用？！

这是刘冰在《风雨岁月》中的一段原话，他所说的“孰是孰非，群众自有公断”，表明刘冰并不认为学校里团四两派的斗争并非是毫无是非的。刘冰是自动亮相在414这一派的干部，也是414派的干部与同学做了很多工作着力要解放的干部。刘冰的这段话隐晦地表达了他认为414派是比较正确的。

5月30日凌晨，团派“革战团”的一群人，押着刘冰离开甲所，翻过第一教室楼后面的土山，绕过楼前的马路，转移到了旧水利馆楼上。

这一天发生了清华园规模最大的“530武斗”，两派从凌晨开始大打。团派在发动这场武斗时考虑到驻扎在甲所的团派“革战团”武斗队伍也要投入武斗，甲所不安全，为了防止刘冰乘机逃跑或被老四解救，所以提前将刘冰转移到了旧水。

“530”这一天的武斗打下来，最终一下子死了3人，重伤数十人。

这些情况，当然是身陷囹圄的刘冰无从知晓的。刘冰当时站在旧水的房间内，透过窗子，看到对面建筑馆房顶上，远处大礼堂圆形屋顶上，都有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的人在匍匐、在走动。白天，能看到的建筑馆和旧水利馆之间的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只偶尔有手持长矛的人从东面机械厂的平房处朝建筑馆跑去。夜晚，建筑馆、旧水利馆灯光昏暗，从礼堂的圆顶到清华园西北部，远处一片漆黑，午夜划破长空的枪声（改写者注：这是不确的，530没有动枪。）和两派广播台的对骂声交织在一起，久久不停地在夜空回荡。刘冰躺在楼板上体味着这阴森森的武斗夜景，好像在做着一场噩梦。此刻，在教学大楼，在科研中心，在工厂车间，在东西两大操场，在教工住宅，在学生宿舍，人们或在愤怒，或在哭泣，或在议论，或在沉默，偌大的清华园没有一个平静的角落。

刘冰在旧水利馆楼上待了三天，吃饭喝水都需要多次催要才给一点，对他的看管也放

松了。刘冰在房间里可算自由自在，但思想沉重。作为一个在清华大学工作了十多年的主要校领导，他时刻担心着学校的建筑物、教学仪器、科研设备处在被毁坏的危险之中。

三、生物馆，一个半月

三天过后，“革战团”的一伙人押着刘冰转移到了生物馆，关在二楼北边的一个房间里，给刘冰布置的任务是学毛选、写检查。

空气平静了几天，刘冰从广播中听到，两派仍然在武装割据，构筑工事，战云密布。这一阶段，除了每天送三次饭外，没人过问。

从5月30日以来，刘冰已十多天与家人失去联系。为了减少家人的担心，刘冰考虑尽快与家里取得联系，尽可能让家里人知道他被关在生物馆楼上。

在刘冰被关进甲所之前，作为已被打倒的走资派，他的家已经被迫从九公寓搬到学校最北边与清华附中隔壁的二宿舍。那里距离生物馆很近，刘冰每天从生物馆二楼透过窗子眺望着二宿舍的上空，他是多么盼望能见到亲人啊！

有一天早上7点半，刘冰从窗户朝下看，突然发现小儿子夏阳骑自行车通过河渠上的小桥朝南驶来。夏阳渐渐地走近了，刘冰看见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看见孩子幼稚的脸颊上蒙着愁云，看见孩子的两只眼睛四下里张望着，似乎怕什么似的，慢慢行驶。刘冰多么想大喊一声：“夏阳！爸爸在这里呀！”“夏阳，你抬头看一看，爸爸在这里！”但是刘冰不能喊，但无法预计他这一声喊出来会给孩子和他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噩运。

眼前亲儿喊不得，心如刀绞泪满襟。

刘冰意识到孩子这是到101中上学去。在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和5点这三个时间刘冰继续观察，发现12点20分，孩子经这里回家，1点半经这里上学，5点半又经这里回家。

就这样，刘冰每天都能三次看到他的亲儿，精神上得到的既有无法言表的痛苦，也有无法言表的安慰。后来几天，刘冰还看到了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春阳和红阳路经生物馆后门

前面的小桥。

刘冰看得是那么的真切，他甚至看到春阳穿的是一双懒汉鞋，立刻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我需要洗换的内衣，鞋子也破了，给我买一双像春阳穿的懒汉鞋送来。”刘冰的意思是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武斗中还平安地活着，并说明自己还能看到儿子脚上穿的鞋子，这样家里人也许会从儿子走过的地方猜想到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刘冰向“革战团”一位负责人说明所需要生活用品，把纸条交给了他，他答应把纸条送到家里，等准备好了再给取来。纸条家里收到了，东西也送来了，但家里人始终没有猜到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因为儿子穿着那双懒汉鞋走过二宿舍周围远近许多地方，好几处建筑物都是“井冈山”派的据点。

刘冰在生物馆一直待到7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除了基础课教研组造反派来“审问”过一次并动了武外，其他来人询问某件事或要他给写什么证明材料，都还讲理，没有侮辱之词，生活也较为安定。刘冰除了学习“毛选”，在房子里一天三次进行身体锻炼。刘冰是个老革命啊，他立志不能把身体搞垮，要健康地走出蒯大富的牢笼。

四、200号，八天

7月中旬一天拂晓，“革战团”头头把刘冰叫醒，让他立刻整理行李准备转移。随后，一群学生模样的人手执长矛，让刘冰背好行李，再用绳子紧紧捆住他的胳膊，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一个人抓住他的衣襟，要刘冰跟着他走。

出了楼门，过了生物馆到校医院去的河渠上的小桥，跑步过了西大操场，经过学生宿舍一、二号楼，绕过电厂，从清华附中校墙后的稻田里，押到北京体育学院门口。刘冰听到那几个拿长矛的人小声嘀咕了一阵子后，又被拉着跟他们走，透过蒙面毛巾，刘冰看到是沿着体院的校墙转弯向北走。刚走不远，后面一个人叫喊：“不要走了，停下来在这里等车。”于是那几个人用手摠着刘冰原地坐下，摘去蒙面毛巾，然后给松了绑。

刘冰回忆说：这时太阳已从地平线上露了头，火红火红的光焰，映衬着绿色的原野，晨风阵阵拂面而过，我的心情突然间舒展了许多，这大概是大自然神奇的魔力吧，我是多么渴望自由啊！

猛然，从体院门口校墙转弯的地方又走过来一群人，押着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副部长林泰朝刘冰的方向走来，并要他二人也就近坐下。三人互相看了又看，往日的战友形同路人，想说话却有口不能言！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那些人把刘冰等三人重新用黑布条紧紧缠住眼睛，推到车里开上走了，这一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车子飞速地奔驰，三人在座位上紧挤在一起，用身体接触传递着战友之情，但谁也不能说话，因为前面座位上的人和开车的人都是“铁杆造反派”。

刘冰虽然看不见，但他熟悉清华和体院朝昌平方向的道路与地形，凭感觉知道车子先向东而后再向北，他猜到是向昌平方向行驶，估计可能是把他们运往三堡（清华教工疗养所），要路经昌平、南口而后顺关沟上山。车子向北行驶着，约一个小时后，突然转向西行，跑了约两公里后又转向北，路一直较平。刘冰感到这不是去三堡了，因为昌平到南口最少也有三、四公里，并且快到南口时要下一个大土坡，因此刘冰断定这是到200号（即清华原子能研究所）。

果然不错，车子很快地停下了，一些人骂骂咧咧把三人拉下车，把刘冰送到一个房间后，去掉缠眼睛的黑布，刘冰立刻认出这里是200号的宿舍楼。那些人问刘冰：“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刘冰说：“200号。”那些人惊奇地骂道：“你这老家伙怪聪明呀，你怎么知道是200号？”刘冰说：“从参加工程规划讨论、看地皮，到参加开工奠基，直到建成，我多次到过这里，这些房间我都看过，你们骗不了我。”

刘冰在200号住的这个房间窗户也早就全部用木板钉住了，屋子正中央吊了一个100瓦的大灯泡，到了晚上，通夜不关，照得眼睛发花。一张双层床，一张抽屉桌放在床边，床就是凳子了。刘冰注意到房门的上方正中间有一个筷子粗细的小洞，估计是用来监视的。

这天夜里12点钟，看押的人将刘冰带到另一个房间“审问”，要他交待所谓“自觉反

毛主席和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的问题。¹

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刘冰顿感震惊和突然。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听到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

刘冰回答说：“第一，我最崇敬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来，从没反过毛主席，更说不上什么自觉反毛主席了。第二，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第三，你们说我们党委有人交待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谁交待你们去问谁？”

审问的人拍着桌子大骂：“你不老实！”

一个女学生横鼻子竖眼睛，怒不可遏，拿着记录本抖擞着说：“刘冰！你刚才的话都记在本子上了，板上钉钉儿，这是你不老实的罪证。”

审讯一直进行到凌晨2点钟，才让刘冰回到房间。一连几天都是午夜12点“提审”。有一天夜里“审问”时，刘冰听到不远的房间里有重重的鞭打声和惨叫声。

审问的人问：“刘冰！你听见了没有？是什么声音？”

刘冰说：“这是拷打，是逼供信，你们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吗？坦白地说，我不怕。”

那些人接着就打起了刘冰，他们用棍子、板子和拳头猛打了一气。

刘冰被打昏了，但仍然坚持站立着，依靠着墙壁没有倒下。

他们看到没有用，就变换手法。

一个姓孙的头头说：“刘冰，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你的儿子抓起来了，他交待在家里你骂毛主席，这就是证据，你不交待，也能判你的罪。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应该说吧。”²

一听到儿子被抓起来了，刘冰立刻难过得揪心疼痛。刘冰冷静了一会儿，心想这可能不是真的，也许这是他们的攻心术，我不能上当，要揭穿他们。刘冰当时没有想到，他们

¹ 1967年11月，团派《险峰》战斗组的《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鲍长康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两篇大字报，系统地提出了“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

原自控系总支书记凌瑞骥赞同“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中上层干部自觉反党论”，他在团派召开的批判吕应中的全校大会上说：中上层干部由于经历和政治水平不同，对中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自觉程度不同，有些中上层干部是自觉意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是自觉反党的。

² 刘冰在回忆中道了此人姓孙，但没有点名。此人是谁？我们至今不确切。团派负责干部问题的部门叫“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人是陈继芳。“二办”下设许多专案组，其中孙耘同学也是负责人之一。这个姓孙的是不是孙耘同学呢？我们不能肯定，也不作猜测。因为那时候孙耘也可能因“罗征敷案”还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里呢？

果然抓了他的两个孩子。

刘冰说：“你们抓未成年的孩子，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只能证明你们违犯政策，理屈词穷。”

审问的头头说：“看起来你是一个老顽固，真是顽固不化了。”

这帮人几天来对刘冰进行连续不断地“审问”，逼刘冰承认“自觉反毛主席”。

此时的刘冰已作了死的准备，他估计他们会“狗急跳墙”，为了某种需要可能要害死他。刘冰心想，必须要人们知道真相，不能被诬陷。

刘冰用了很小的一张粉白纸条，写上：“他们逼我承认‘自觉反毛主席’，我没有，永世也不会反毛主席。刘冰遗言。”

刘冰将棉被的边子多次折叠与压缩，用手轻轻把缝在边上的棉线拉长，用手从被边的缝中伸进去，直到被里的中央。刘冰把纸条夹在里边，然后慢慢放松让被边还原，居然不留一点痕迹。刘冰将“遗书”一事处理停当后，内心感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超常坦然，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力量。他似乎将一切准备好了，随时准备牺牲了。

残酷的迫害在日以继夜地继续进行着。

拷打和威胁的办法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歹徒们就用“罚站”的办法。24小时不准坐、不准躺，让刘冰站在屋子中央的大灯泡下，歹徒们在屋外通过门中间的小空洞随时监视着。刘冰的脚腿都站肿了，为了坚持同他们斗争，刘冰躺在地下闭目养神，把两条腿抬高蹬在墙壁上或放在床边上，使血液回流，这样既可减轻腿脚的肿胀，又可得到全身的休息。歹徒们发现后冲进房间，再猛打一顿；他们一离开，刘冰又照样抬脚躺在地下，保存体力，有时还真能睡上一小会儿。

刘冰就这样和他们斗争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拂晓，不顾一切地躺在床上睡熟了。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钟，睁开眼睛，桌子上放着一碗粥和一个窝窝头，房子里只有大灯泡还在发亮，一切都静悄悄。

刘冰说这标志着他们又失败了。刘冰坐起来，大口地喝完了那碗粥，靠在床上啃着窝

窝头又睡着了。12点半来送午饭的人把他叫醒时，刘冰的嘴里还啃着没吃完的那块窝窝头。

刘冰在200号度过了一周真正的囚犯生活，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日子到来，开始了室内锻炼，并要求每餐饭增加到两个窝窝头，如果不给，刘冰就绝食抗争。刘冰说我要千方百计保持身体健康，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五、北航，七、八天

突然，在第八天的夜晚，那个姓孙的头头通知刘冰打好行李，准备离开。看押的人一个个鬼鬼祟祟、神神秘秘地在楼道上穿梭走动，看上去还有点惊慌。刘冰估摸不透他们又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听到楼下有汽车马达声，头头大声吆喝着：“快！快把他们带上车！”接着他们用几层布蒙住刘冰的眼睛，又用电线紧紧捆住刘冰的手，勒得两手全都麻木了，然后把他推到卡车上。

车上已经挤满了人，好像都是被捆绑着，刘冰碰到背后的一个人，也是双手被捆绑的。车上空气沉闷，没有人说话，只有那些手持长矛的人吆喝着：“人齐了没有？快开车！”

汽车驶出200号，跑到公路上，先向东跑了一段，而后向南开去，这是去北京城的方向。刘冰估摸着车子已到了清河镇，但没有向西拐弯，却继续向南。到哪儿去呢！？

突然，车内有一位女同志大声呼叫：“救人啦！有人抓人呀！”

有个人说：“快拿毛巾捂住她的嘴。”

接着就是一阵乱打。另一个人喊：“狠狠揍，打死她！”

车内乱起来了，那位女同志挣扎着，人们相互碰撞。看押的大声骂着：“妈的！动什么！不准动，谁动我揍谁。”刘冰的耳边又响起了噼噼啪啪打耳光的声音-----

那位呼叫的女同志，声音好熟悉呀！是谁呢？刘冰想了许久，判定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同志。刘冰又判断车上捆绑的人大概都是校党委和系总支书记以上的学校干部。

车子飞速奔跑，上下颠簸，刘冰的双手被电线勒得不仅麻木，而且有一种难忍的热辣辣的疼痛感。刘冰向看管者说：“我的手已经疼得不行了，你们给我松松行不行？”看管说：“不行，你忍着点吧。”然后捅了他一拳。刘冰说：“你们是哪家的政策？这样对待干部？”接着，他就又挨了一拳。刘冰只好老实了。

车子终于停下来了，好像到了一个灯光明亮、人声嘈杂的大院里，接着听到“北航广播站”几个字从喇叭里传出，于是判断这是来到了蒯大富的铁杆造反派战友韩爱晶管辖下的北京航空学院了。

大家被拉下车，带到房子里。

刘冰住的房间有三张双层床，里面住满了人。刘冰被指定在门口的下铺。

刘冰说：“我的手疼得厉害，你们赶快解开吧！”

一个人说：“给他解开。”

手是解开了，但肿得厉害，两只手的指头都不能弯曲了，疼痛难忍，痛苦不堪。刘冰请他们弄点热水泡泡手，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刘冰忍着疼痛，强行活动手指手腕，一个星期后才消了肿。但是，蒙眼睛的布他们不给去掉，只是吃饭时才给解开。那时正是7月底8月初北京最热的季节，每天汗流浹背，汗水浸到眼里，严重损害了视力。

在“北航”的七、八天，什么事也没有，每天除了三顿饭，都是蒙着眼睛，生活在黑暗中。刘冰躺在床上听着“北航广播站”的播音，想知道的清华情况听不到，不想听的，却没完没了地大吼大叫，听疲乏了睡觉，睡醒了又听，昼夜不停，天天如此。¹

¹ 刘冰从200号转移到北航的时间一定发生在1968年7月28日或29日深夜。因为727工宣队进校，728凌晨蒯大富才作出了撤离清华的决定。以这个时间点为基准往后推：刘冰在北航呆了七、八天才回到清华，也就是说回到清华的日期是在8月4日左右；回到清华第五天才被释放，也就是8月9日左右。以这个时间点为基准往前推：刘冰在回忆中说他是在7月中旬一天拂晓从生物馆到200号的，可是他在200号只呆了一星期，第8天就被转移到了北航，而他在北航也只有七、八天，所以可以推断刘冰从生物馆转移到200号的时间是7月20日前后。团派将案犯的每一次转移当然都是有原因的。7月28日或29日晚从200号转移到北航是因为发生了“七二七事件”，蒯大富在7月28日凌晨虽然下达了撤离清华的命令，同时却保留了9003、化学馆、生物馆几个据点。那么200号的案犯怎么办？蒯大富则下令撤离至北航。这件事虽然未经文字记载，却是有根有据的合理推测。

六、回到清华生物馆，五天，被释放

8月初的一天夜里，刘冰又被秘密地转移了。刘冰敏感到这次转移与以往都不一样，虽然也被捆了双手，但没有蒙眼睛。刘冰看到车子离开了航空学院向五道口方向开去，啊！这次是回清华了！已是午夜，天漆黑漆黑，但还能看得清两旁农田里一片片齐刷刷、略比人高的老玉米，夜风一阵阵从玉米地里吹进车窗，带着秋庄稼与熟土地的香味，沁人心脾。

车子进了南校门，经过照澜院、静斋、强斋、职工食堂，刘冰失望地看到又把他送进了生物馆，而且这次是被关在阴暗潮湿、蚊子乱飞的地下室里。

这一夜，刘冰躺下时已是凌晨两点了。地下室里蚊声嗡嗡地，刘冰心潮翻滚睡不着，索性起来打蚊子，有时一巴掌下去就能打上两、三个。

第二天上午，一个造反派头头来向刘冰训话，还是往日的一副嘴脸、一副腔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啦，老老实实交待罪行啦等等。头头大约讲了一刻钟，就溜之大吉了。

刘冰在地下室呆了三天，每天除了三顿饭，主要工作和乐趣就是打蚊子，当然还有学毛著、背语录。

第三天夜里12点钟，刘冰还躺在床上分析形势。他觉得很奇怪，造反派对他的管制显然放松了，在地下室也听不清两派的大喇叭，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想啊想，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所以然。他忽然想起中午发的两个窝窝头还剩下小半拉，如果不吃掉放到明天就坏了，于是打开抽屉取出那半个窝窝头坐在床边吃起来。

刚咬一、两口，房门突然被打开了，看押的人带来一男一女两个解放军走到房里来。刘冰立刻放下窝头，从床边站了起来。

一个解放军问道：“你在吃什么？”

刘冰说：“我在吃窝头。”刘冰还将半夜吃窝头的原因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两个解放军问了问他的身体情况，大约呆了10多分钟就走了。

这件事又让刘冰感到蹊巧，想到是不是他认识的什么老领导或老战友想起他来了？但

这不可能，他认识的那些人一个不拉地全都被打倒了；他想是不是他于66年10月与67年2月两次给毛主席、周总理写的信起作用了呢？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好事吧？刘冰想啊想，一直琢磨到天亮，也没找出个答案来。

第四天上午来了两个造反派的小头目，要刘冰整理行李，搬到二楼，关在二楼中间朝北的房间里。居住条件改善了，刘冰当然有点高兴。下午两、三点钟，刘冰看到楼下北面的桥上先后走过了三批群众队伍，打着大横幅“拥护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刘冰这才知道清华园终于变天了。

刘冰太兴奋了，这一晚他又没有睡好觉。

第五天下午，团派的一个头头带着一位解放军与刘冰谈话。头头说：“现在把你交给宣传队了，今天下午你可以回家了。”解放军说：“你回家后，可以休息一天，换洗一下衣服，理理发，后天上午带上毛主席语录，到工字厅报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大约只过了20分钟，那个头头又回来说：“你可以走了。”

真的可以走了吗？刘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位工人师傅送刘冰回到二宿舍，老伴苗既英接过了行李，送走了那位老工人。苗既英回到房里，上下打量着刘冰，失声痛哭：“你照照镜子，看看他们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头发胡子快长成辫子了，你瘦多了，把你关了整整10个月啊！什么造反派，简直是造孽派！他们不仅打伤了好多人，还打死了人，主要是几个头头干的，同学们是被煽动起来卷进去的，这些你全不知道啊！我带着四个孩子，整天提心吊胆，我怕再出事。红阳和夏阳被蒯大富的人抓去关了一天，红阳被他们打了一顿，孩子有什么错，你的工资也停发了，怎么能这样对待干部呢？”

5点半钟左右，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见到父亲回家都非常高兴，围起来问长问短，过了好久才发现父亲的头发、胡子太长了。大家又骂起造反派。刘冰记得那天晚上吃的烧茄子、豆角烩粉条，煮了一锅小米粥，从食堂买来馒头与窝头。十个月来全家总算在一起吃了团圆饭，那顿晚饭可真香！

晚饭后红阳、夏阳讲了他们被造反派关押的情况，刘冰也讲了10个月来受到的摧残折磨，大家又在一起咒骂造反派。

第二天，儿子给刘冰理了发，刘冰自己烧水洗了澡，来了一次全身大扫除。苗既英对刘冰说：你看上去精神多了。

第三天早晨七点半，刘冰带上毛主席语录，到工字厅向工宣队报到。

不管以后还要这么着，刘冰就算活过来了。■

【述 往】

难忘的燕园·1969年（六）

——尾 声

吴 琼

我在河北宣化军工厂劳动锻炼一年之后，被分配到河北衡水地区师范专科学校，任教8年，32岁时才结婚，妻子是一个北京知青、衡水地区医院的护士。改革开放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1978届中哲史硕士生，三年研究生毕业后，又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工作8年。因为感到我国的军事基础理论和战略学基础理论薄弱，我在任教期间，开始研究德国近代克劳塞维茨撰写的世界名著《战争论》。

1989年，因妻子患脑瘤不治去世，女儿幼小，我转业回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同时，继续研究《战争论》和战略学。我1998年退休后，并没有中断研究工作，近20年来，一直给北京大学和深圳华为公司等院校和企业讲《孙子兵法》、《战争论》，以及英国现代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和美国当代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多年以来，我总觉得未婚妻马明明每天都在天上关心、注视着我，所以，我没有理由休息，只有尽心尽力地工作。

吴允曾先生已于1987年去世，终年69岁。我在北大做研究生期间，曾经多次到未名湖北岸的备斋，向吴先生请教逻辑学问题。有一次，我还陪同在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工作的哥哥，一起到备斋，请吴允曾先生解决哥哥所在单位的一个理论难题。

邓艾民先生于1984年去世，只活了64岁。记得在我研究生毕业、赴大连工作的前夕，邓先生曾经在友谊宾馆为我饯行，喝的是红酒，吃的是红烧大虾。我到大连后，邓先生还几次给我寄来他撰写的宋明理学书稿，希望我和他合作，完成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令人遗憾的是，我到部队院校工作后的环境条件完全变了，无法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这是使我非常内疚的事。

在我危难时曾经给予我帮助的郑金玲老师，后来嫁给了一位在水利水电部门工作的高级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是清末爱国名将左宗棠的后代，人很正派。可惜的是，郑金玲夫妇没有孩子；但是，郑金玲把小学里的所有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在教育战线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她现在也已退休。

我的母亲于2011年去世，活到94岁。她老人家是在旧社会天主教“仁慈堂”即孤儿院里长大的。母亲一生经历坎坷，多灾多难，但她的性格坚强，有毅力，从不服软，困难面前决不低头！她是我学习的榜样。在她生前，我对她很孝顺，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

现如今，在北京东郊有一片美丽、宁静的园地，园地中有一处不为人所知的角落，这个角落，就是近五十年前埋葬明明的地方。这片美丽的园地现在已经属于北京朝阳公园的一部分。在这片园地的附近，有一座装修得很正规、漂亮的游泳池，还有一道流着潺潺溪水的小河，河流上有一个新建的小水坝。我每年隔些日子，便会独自一个人来到这里，在原来埋葬明明的那个地方停留一会儿，沉思默想。

放心安息吧！明明。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和养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们没有虚度青春年华，没有碌碌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我们的爱。请你高高兴兴地等候我们在天上幸福重逢的那一天。■

写于2016年春节前后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八）

——两派对立

陆伟国

一、鹬蚌相争

1. 两派的由来

到了1967年初，形势出现了变化。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两派。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已不再限于学校和学生，在各地各单位应运而生，波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和乡村。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也有的是假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这可都是真的）。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

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各种群众组织由原先对批斗“走资派”时的不同态度而划分为造反、保守两大类，演变成了争夺本地、本单位实际控制权的对立两派。在“有权就有一切”的专制体制下，谁也不肯也不敢甘拜下风，只有拼死一搏、绝无退路。全国的两派斗争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

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去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

有个现象可以看出来，极左势力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他们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从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防止其政党化，以免尾大不掉、成为分享权力的潜在对手。比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等等，只因为是全国性组织，并没有什么理由就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和镇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书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都有害人者，两派都有受害者。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被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而被相继抛弃。只不过被抛弃的数量和程度，在各派间有所差异。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说到极左，两派都受极左的影响，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抢到还是没有抢到权。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或“保守”）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掀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则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千万不能被

别人压在底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绝没有半点退让的余地。在传统行政体制下，自以为还有点利益的，往往倾向于保护本单位的领导，那就是所谓的“保皇”了。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而军队的介入，所谓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更使矛盾扯不清理还乱、甚至火上浇油。

说到底，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争权夺利者的必要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即使是前期的“保皇派”，也是如此，都扯起了跟着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旗子，也会揪斗倾向于对立面的当权派，而且斗起来也毫不手软。

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退让。

2. 关于造反派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比如说，主要的有：一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二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激烈斗争，甚至数次反复，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了最后胜利。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

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

本文的这个看法，并不等同于海外学者中有一种“两种‘文革’”的说法。所谓“两种‘文革’”的说法，就是把上面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斗争，说成是“文革”中的又一个“文革”，是人民群众起来造“官僚集团”反的“文革”。有人还给起了名，叫“人民文革”、“群众文革”等等。

但是，这儿所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斗争，始终不是“文革”的主流，甚至并没有形成一种单独的潮流。这些起来斗争的群众，不仅还是打着极左的旗号，而且总的来说，还是在极左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为极左势力所利用和服务，最后，有的直接成了极左势力的鹰犬，而多数则被压制。有的虽有觉悟，也已晚了，成了这场左倾狂潮的牺牲品。他们的表现虽有不同，但都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两种‘文革’”的说法，近来被有些企图煽动再次“文革”的人所利用。他们装着否定党内高层的“文革”，而鼓吹再用第二种“文革”的办法来冲击和惩治当前的“官僚集团”，这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现在似乎名声不大好。谁要是嗓门大点，就要被讥讽为造反派的脾气。其实，这个群体，它的组成也是很复杂的。大体有这样一些人在里面：

原有体制下受到压抑，起而反抗的人；

听从领袖号召，造反有理，真心实意投身革命的人；

出于朴素的正义感，觉得这社会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经验老道，看见有机可乘，想要重新洗牌的人；

流氓本性，好打好杀，想毫无顾忌痛快一番的人；

本无身份地位，红五类不要，别无选择；

因为各种原因，前期受到冲击，对保守派有纠结；等等。

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一成不变。他们的认识、心态、行为，随着事态的变化、遭遇的不同，也会有多种改变。

有新参加进来的：明白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反戈一击，来了；有看到造反派一度得势，重新站队，来了；迫不得已，表态支持；等等。

更有出去的：看透了极左势力，知道上当，走了；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处于劣势，趁早弃船而去，走了；迫于压力，投降了（此处无贬义。在有些地区，投降也不行，照样被屠杀）；等等。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两派都好不到哪儿去，说“造反派”不过是想当奴隶都当不上的人（比如：出身不好、知识分子、受单位领导压制等）在争取当奴隶，而“保守派”则是通过维护单位领导来保住自己可怜的奴隶地位。本文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也无意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也不表明褒贬）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造反派中也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虽然他们当时看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完整和准确，但也足够我们深思。■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二）

——单人监禁

宋翔雁

一、自我调整

在初级班接受审查期间，尽管因条件制约，专案组在人身侵犯、迫害上稍有收敛，但处于被隔离状态下的我，除在批斗、审讯时思维极度亢奋，能有机会与提问和批判者讲话外，在其余时间里，我身居斗室、面壁而坐，除偶尔能听到一些外面传来的声音外，一直

孤单地处于静寂无声的环境中。过去所得到的知识告诉我，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其思维和语言能力，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批斗与隔离，我也估计到自己的问题绝非短期内能够得到解决的。因此自己必须想办法预防人体在这种状况下的自然蜕变，不仅思想上要和迫害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精神和身体上，也要和这种隔离环境作斗争，预防出现所谓的“隔离性病变”（这是我自己起的名称，医学上有无专用名称我不清楚）。否则，即使今后保有了政治上的清白，精神和身体上病变的出现，也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废人，那时将何以面对社会和家人？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我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心态，并尽可能地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加以改善，尽可能减少孤独、寂静、无声、不动等因素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些自我调整措施，说到底实际上就是对专案组的打压迫害措施的隐性抗争。因为学习班是以党领导下的名义办的，专案组成员中，可能绝大多数还是共产党员，公开抗争招致的是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罪名，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自明，而且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所以，当时我在学习班中就有一种看法：共产党的牢是最难坐的。我指的难坐，不仅仅是牢房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也不完全是刑讯和逼供对人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身披共产党华丽外衣的牢房中的黑暗和恶势力，受害人几乎失去了精神上的宣泄权——指责和谩骂。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毕竟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深信不疑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如今公开宣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给我办的学习班，口口声声地说是为了“挽救”我，是为了把我从敌对的阵营里拉出来。面对这种绝对正面的说教，不承认它都意味着是反对，那还能对其公开地争辩、揭露和抗争，将自己明摆着放在反党的位置上呢？！

所以，即使知道学习班里所采取的措施都是违反政策规定的，但你也不能采取公开对抗和谩骂、指责的态度，还得口口声声地承认是挽救、是苦口婆心的教育，装出感恩载德的样子。正因为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给被迫害人办的牢房，所以被关的人们就不可能像江

姐那样英雄般地面对刽子手们。当然，面对共产党办的牢房，确实还有个别真正有骨气的中国人做到了直面抗争，英勇就义，书写了历史进程中的光辉篇章。他们就是张志新烈士和尚未被执政党认可的林昭女士。但即使已被追认为烈士的张志新同志，也不可能像其他众多正面英雄那样，受到媒体的多方面的反复光顾，因为执政党还要顾及到负面效应的存在和影响，担心伤及到执政党自身的形象。大概这也可算中国特色吧！

我所想到和所作的调整措施必须是隐性的，即不能让专案组的成员看到或看出来，万一被看到或看出，也立即能有应对的办法和解释，否则必将遭到惩处或禁止。实施自我调整实则是一种智斗，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专案组成员眼皮下作的，他们也会猜测你的意图而加以反制。如你想借上厕所外出（干校是公厕），就限制你的喝水量；你想在外面多滞留，就反复催促和申斥等。智斗本身无形中也扩大了自己思维的活动面，对自身也是有益的。

在初级学习班里，我的自我调整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借如厕，争取外出行走和观看景色及人群。从学九楼学习班到公厕估计有250米左右，我把自己的步距限制在0.6米左右，这样要走420步左右，而按平时我的步距约为0.8米，则310来步即可走到。这样一来，我就需多走120步，大约就可多滞留两分钟时间。只要我匀步前行，尽管慢点，押解我的人也不好说什么，因声音大了，路上来回行走的人较多，听到他们催促被隔离者也担心影响不好。

此外，有时我还在出行前，特意将鞋带虚系上，出去后，借机另支脚一碰就开了，这样我就必须蹲下来系鞋带，又给自己多争取到一些停留时间。说句老实话，自由人是很难理解被禁闭者渴求在室外多停留片刻的心情，为了多看一眼美好的自然景色，多看一眼行走匆匆的人群，都需要撒费苦心地算计，这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分秒必争了。

由于往返于厕所和学习班之间的总会遇到其他干校学员，这就让专案组的人特别紧张，但又不能不让我去厕所，故他们就采取限制我的饮水量（以前我都是自己去倒水，室内有我个人的暖水瓶。但从限量喝水后，就需向专案组成员要水喝，这样我的饮水量一下就从

每日六杯减到了每日三杯），想借此减少我排尿的次数。对此我曾向专案组人员提出过抗议，指出这将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是不人道的行为。但这毫无作用。几天后，我的口腔就开始出现溃疡，说话、吃饭度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我向当值的李鹤忠要水时，他非但不允还说：你还想享受呀？要想喝水，就老实交代你的问题。面对这种恶吏（他曾是右派，在运动中会以更左的面目出现，是我一进学习班就预料到的），我知道与之对抗非但不会起任何作用，搞不好只会激化矛盾或恶人先告状，使我更加被动。于是我义正辞严地说道：饮水是人体的正常需要，与享受一说无关，请你向军宣队和组领导反映我需要喝水的要求。言毕我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尽管当时他并未给我倒水，但也并未在发出恶言恶语的诋毁声。

当晚，在例行的全体会上，在我汇报当日情况后，就又将限量饮水问题正式在全体会上提出，并将上午李鹤忠喝水享受的谬论也作了汇报，谈了自己的想法。重要的是我指出：自到学习班后，我每日一瓶水（5磅）全部喝光的事实是大家都看到的。我不清楚现在为什么要限制我喝水，这已经导致我尿液很黄，口腔开始出现溃疡，而且下颌淋巴也已肿大，我要求立即向军宣队反映这一情况，解决我的饮水问题，并允许我明日就医。在说话的过程中，我转身向我身边的黄津生张开口，伸出舌头，请他观看我口中的两个溃疡斑块。黄看后向杜展凯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但没再说什么。面对我有理有据的陈述，杜不便当即表态，只简单说道：你的请求我们会向军宣队反映，就医的事明天再说。

第二天大约十点钟，专案组终于带我去校医室就医（这是我隔离期间第一次就医，也是唯一一次就医），恰好又是陈碧燕大夫值班。她听了我的自述，看了口腔的溃疡情况，并检查了颌下淋巴肿大的情况。然后对我说道：口腔溃疡比较重，所以导致颌下淋巴发炎。外用药（紫药水）一天两次，涂于溃疡处，其中一次睡前刷牙后涂抹；VB2（核黄素）口服，每日三次，每次两片。因服药尿会更黄，注意大量喝水。拿了药谢过大夫后，我们回到了隔离室。我当即向专案组的人要水服药并上药，因允许就医在前，大夫医嘱在后，故要水再未受到阻拦，而且此后基本上就能满足我每日5磅的饮水量了，只不过还需领水喝，而

不让自己倒水。只要饮水够量，其他我也就不去计较了。

二、跟学生班“学英语”。在学九楼内肯定安排有学生上课用的教室，所以经常能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但老师讲话的声音听不大清楚，而学生回答的声音就听得比较清楚，特别是当老师领着学生跟读时，声音就非常清楚了。特别是英语课，学生跟读的情况比较多，我就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跟着学生的发音想偷着学点。因我初中三年学的是英语，而且是教会学校，略微有点底子。只可惜解放后，在仇视、蔑视、藐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下，不愿意学而白白浪费了可贵的学习时间，后来每每想起都觉得后悔。不知是老师不教拼读还是学生不跟拼读，总之我只能听到跟读字词的声音，听不到拼读的声音。所以，有些字词虽知道了发音和意思，但如何拼写我只能靠20多年前学的印象写出来，是否正确并无把握。而且，学习班里除写材料时给纸，平时我手中并没有纸。所以这时我就比较注意尽可能保留一些用过的废纸，留作我作拼写练习时使用。平时练习拼写的纸我都收藏在枕头下的床褥下面，以免被专案组的人看到。但有一次可能因我大意了，而将写有拼写字词的纸张夹在毛选里面了，结果在他们翻弄我的毛选时被发现了。打开后发现有些字还写得整整齐齐的，但几个人看后又不知其意，就问我这是什么？是谁给你的（他们可能担心是外边人传给我的字条）？我回答道：是写材料废了的纸，我留了作书签用的（因恰好夹在老三篇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处）。恰在此时周某某进屋了，他是研究生学历，修过第二外语（一般都是英语），杜展凯让他看看写的什么，看后周说：写的是英语。这下杜更觉得有问题了，表情显得挺紧张的，并立马让周和他一起出去。当时我还有点蒙，心想干嘛那么紧张，而且当时我一直考虑的是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字，以便能较好地应对他们的发问。可我确实很难想出写的是些什么了，心想所写的英文字绝不会有什么问题，都是眼下学生学的内容，到时只能灵活应变了，但不能说出我在“偷听”学生的英语课这一事实，否则必将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过一会杜、周二人回来了，从杜脸上的轻松劲儿，我想不会有啥大事了。坐下后，杜手拿着纸问我，这上面的字是谁写的？我答道：我写的。他又问：在学习班里，你不好好交代问题，写这做啥？我说，没啥，随便写写。杜又问：你在学英

语？我答道：我上哪学去？接着杜将写有英语的纸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是：

flag, This is a red flag. This is a five star red flag.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chairman Mao, Long live chairman Mao.

communist,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看完后我就放心了，并说道，这是我小时候学的，只是用来抒发情感而已。杜接着说道：你要抓紧时间，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别搞小资产阶级那套东西，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才说明你对党、对毛主席有感情，其他都是瞎掰！说毕就走了，我也算闯过了一关，没闹出事来。但跟班学英语的事，后来因学习班“升级”搬至长田农村而终止。

三、隔窗观景，调节心情。学习班的房间有一扇窗户，因原建筑是办公用房，所以窗户较大，而且面向学九楼前面的一片较大的空场地，平时停有各种车辆和拖拉机，还有很多孩子在场地里玩耍。我坐在室内的书桌前（供我学毛选和写材料用）通过窗户就能看到室外的情况和玩耍的孩子们，在场地前面，就是从外面进入干校的大道，人来人往的很多，但因距离比较远了，很难看的十分清楚。因有这样一扇窗户，没人在房内时，我就可以凭窗“远眺”，也不失为一种调节孤独心情的一种有效方法。特别有时能看到干校“鸭司令”（负责养鸭子的一位干部，大家都戏称之为鸭司令）哄赶着一群鸭子沿大道返回鸭棚时的有趣情景。尽管在室内看到的鸭子大约也就像麻雀一般大小，但他们扭摆着走路的样子，再加上鸭司令的那身打扮（头顶大草帽，脚蹬大套鞋，手上还拿着一根很长的鞭子）看了确实令人发笑。由于看的专注，有时尽会失声地笑出声来，这时好像已经忘记自己正处于完全失去自由的隔离之中，由此可以想见其调节效果非同一般了！

在一次隔窗观景时，我偶然看到可能是爱妻带着一个小孩在场地右侧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上玩耍呢。这时我身不由主地就站起来走到窗边仔细观看（平时我从不靠近窗户，避免受到申斥，更怕因此专案组的人会把窗户挡上），确实是昭明带着一小男孩在拖拉机哪玩呢。我好高兴呀，因为那男孩肯定就是我儿子，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但从他

一会爬上，一会跳下，一会坐在拖拉机的座椅上的情景，我觉得他很敦实、很好玩，个子似乎也高了不少。这是我被隔离后，第一次看到他们母子在一起的情景。我也看到在看护孩子玩耍的同时，昭明不时还往我学习班住地的房子反复张望，这时我会隔窗向她摆手，但显然她没能看到（可能因反光有关）。我知道这是昭明的良苦用心，想尽办法希望我能看到孩子的情况，内心一股温馨而感激的暖流，让我觉得浑身发热，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差点我就有可能失声地喊出来。但现实的残酷让我咬紧了牙关，把思念、关爱、盼望、感激、祝福等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所有美好情感，通通深藏在我的内心深处。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一定好好活着，我背负了几十年的家庭出身包袱，绝不能再让儿子也背上同样的反革命子女的包袱，而影响他的一生。眼前的苦痛就算我也包含其母亲，为他的美好未来所作的付出吧！据称，在地院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我是坚持最久拒不承认的一个，对此还得到一些人的赞誉。

借此文之机，我只想说明两点以解除内心的不安：①我并未坚持住，最后还是违心承认了。与他人比，只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本质上是一样的；②直白地说，我坚持的动力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了孩子。让他能不再背家庭出身的包袱，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其他的更多理由都在其次。在观看母子玩耍和思绪跌荡起伏的同时，我十分警惕地看着屋门，担心专案组的人会突然进来。但幸运的是，直到昭明母子离去，都没有人回屋。当昭明带孩子要离开时，我注意到昭明还回过头朝我住的房子看了好一会儿后，才牵着孩子的手一步步离去。自此以后只要有条件，几乎每到下午的这段时间（我估计是昭明从托儿所接孩子的时间），我都会非常注意窗外的情景，希望能再次见到昭明母子在此玩耍的情况。因受条件限制，在我迁往长田之前，昭明母子在场地玩耍的情况，我又在窗前看到过三四次。可以说这时是我在隔离审查期间最幸福的时刻，孤独、苦闷之感似乎都抛于脑后了。

四、注意活动四肢和能活动到的关节。在学习班里是没有运动和锻炼条件和可能的，一开始宣布纪律时就规定了，除睡觉时间外，其余时间只允许坐在给我准备的书桌前学毛选、写交代材料、想自己的问题，不允许在室内随便走动。但我相信生命在于运动的教诲，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在坐姿条件下，经常活动四肢、腰、颈等各部位的关节。只可惜当时不懂得气功，更不知瑜伽为何物，否则静态养生、入静护体，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此外，我还臀部离开凳面以骑马蹲裆的姿势练习双腿的肌肉（这是中学时蛙泳教练教的）。总之，只要隔离室内只有我一人时，我就在表面上不违规的条件下，尽可能让身体的不同部位都能得到一定的活动量，用现代医学话语讲，就是预防功能性障碍出现。正因我在整个隔离期间都特别注意身体各部位的活动，才使我的身体最终承受住了隔离期间的残酷迫害，但左腿因长田关押时期变本加厉迫害，最终还是患上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后文再述）。

通过在初级班期间的自我调整，逐渐在我的心底里成型了三条自我约束的准则。即一，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搞事后甄别那套做法；二是，振作精神积极面对，以一个战士/斗士而非囚犯的姿态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三是，不轻生、不自残，留取丹心定要经得起妻儿和亲人。万一不遂人愿，估计垂危难挽时，请妻子代为申诉，要求还我清白。

二、妻子的回忆：以鄙视面对歧视

当翔雁一经宣布隔离审查之后，我的工作和我与孩子的生活就立马受到牵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初期的确有一定的精神压力，但并不是主要的。因在各种批判会上，对我施压，让我划清界限，揭发宋的实质性问题。但尽管我搜肠刮肚地想，确实也没有听翔雁和我讲过任何有关“五一六”的问题。而且婚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之间的交往少之又少，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出现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情况我几乎不知。只是让我感到，似乎不是翔雁过不了关，而变成我自己难于过关了。这种奇异的社会现象，在历次运动中，因亲人被整肃而受牵连的群体中，大约都会有这一类似的感受。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觉得我所谈的符合实际情况，故几乎天天照例的批判、“帮助”和勒令揭发、交代等就不再继续进行，至此我身负的精神压力也就随之消除了。因牵连带给我的主要是身体上的巨大压力，如菜班的重体力劳动、繁杂的家务负担、幼儿的生活照料等，有时真压得我透不过起

来，即使有分身术也忙不过来。但我并非娇生惯养之辈，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再重的劳动、再差的生活环境、再紧缺的物质条件，我都不会畏惧，而且都能承担得起，并战而胜之。

但因牵连而带来的歧视犹如一副精神枷锁，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既令人隐隐作痛，也令人气愤难忍，但我却不能直白发作。这种歧视无处不在，不仅反映在制度和行政管理上的明文规定或台下的潜规则操作；更多的则表现为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相识或不曾相识的人群之中。这类歧视明显表现在他们眼神、语言、表情甚至是肢体动作之中。其实这一社会现象并非是我国所特有，被歧视的因由如贫富、地位、衣着、种族等。但人们对被牵连者的歧视恐怕就是中国的特色之一了。这种对被牵连者的歧视不仅是中国的特色之一，而且在我国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牵连歧视的因由主要涉及政治层面，诸如阶级出身、个人成分、政治面目等。产生此类牵连歧视的原因既是党内无情斗争向外的自然延伸而遗毒于民间；又是多年来党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和据此而执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类宣传媒体联合喧嚣，对广大群众原本善良人性的一种改造、变异（或毒害）所造成的结果。时至今日，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喧嚣似乎偃旗息鼓了，但人们对弱势群体、异议人士或与主体意识有所背离人群的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却仍然在延续着。因此，要想真正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成为一个现代型的国家，真正实现主流意识所倡导的中国梦，那就需要让每一个国人都学会并懂得尊重他人、帮助他人这一最基本而又最浅显的做人道理。否则，在处处存在一些人歧视另一些人的国家（即使是多数人歧视少数人），无论其国力多么强大，物质多么丰裕，它都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现代型国家。

因翔雁被疑为“五一六”分子遭隔离后，遭人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印象最深也最刺痛我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人的不尊重、冷漠和不屑一顾的藐视态度，以及讥讽言语的伤害。一次菜班的头头让我去编筐组要一些他们不能使用的竹篾，供我们给蔬菜生长搭架子，故我即刻前往菜班。因到干校后，此前我一直在编筐组劳动，觉得人熟地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当我向组长说明来意后，没想到对方连头也不抬一下，将头朝废料堆处一撇，说道：你自己去找

呗！对编筐组一成立就在一起，共事已达十月之久的一名曾经的下属竟如此冷漠，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令我心寒。故我知趣地不再说什么，直奔废蔑堆处挑选我们搭架时能用的竹箴。在我挑选废竹箴时，看到一些废竹箴上有很多痰，就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将痰吐在竹箴上呀？没想到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被离我较近的一位程姓女性听到后大声说道：呦，这还嫌脏呀？那痰可也是肥料呀！她是翔雁原同室而居室友朱老师的妻子，她本人在平谷一地质队工作，每次回京团聚时翔雁从不厌烦地前往实验室居住，无论时间多长，从无怨言。而且翔雁与朱老师的关系也很好，都是北京25中学（原育英中学）的校友，相差仅一年。所以我们婚后，两家相互间还经常走动，真没想到，当翔雁落难之后，她竟然会如此闲言碎语的伤人。尽管心灵遭到如此伤害，但当我挑好竹箴并捆绑好后，还得强忍内心的痛楚走到组长跟前，很有礼貌的打过招呼，表达了谢意，然后才背起竹箴捆回到菜班。

二、儿子也受到牵连。出身不好的子女在当时的特定政治语境下，有一个美好的专用词汇来形容，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它表面似乎十分中性，显现不出任何歧视味道，令人无可挑剔，因从一般意义上讲，所有人的子女都在可以教育好的群体范围内，为此真应感谢当时在宣教部门工作的巨匠们的政治智慧。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翔雁的问题尚未定性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项桂冠，竟然已经有人要将它戴到我儿子——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头上了，这真让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幼儿园里，我儿子因与另一个小男孩争抢玩具时不慎手将对方的鼻子抓伤了（鼻梁侧部一条划痕），那孩子大哭。老师发现后，即刻将大哭的孩子抱开，并检查了划伤的情况，见无大碍就用酒精棉签消了一下毒而了事了。与此同时，还派另一老师去菜班找我，让我回去看看（因当时还不清楚孩子被划伤的程​​度，怕有问题需另行处理时，好与家长相商；与此同时也让另一老师去招呼受伤孩子的家长回幼儿园）。

当我到幼儿园时，正听到有几个幼儿园的老师在议论，说什么，幸亏没啥事，否则“五一六”分子的子女伤人，就可按阶级报复定罪！因她们说话的声音较大，我听到后朝她们看了一眼既觉得可气，又深感世态的炎凉。但这并未让我觉得悲苦难熬，反倒激起了我对

这些人的蔑视。她们竟能说出这种毫无人性和政策水平的言论，一方面只能表明她们自身水平的低下，不值得理睬；但另一方面，也足见客观环境的恶劣，这倒值得今后自己多加注意，管好孩子，少生事端。当我看过孩子们的情况后，我看得出儿子知道自己闯祸了，我拉着儿子的手，让他对被被抓伤的小朋友道歉说对不起，他乖乖听话做了。我也拉过被抓伤孩子的手，摸着他的头，向他道歉。因他的父母还没来，我只好再在幼儿园里等。

这时我看到幼儿园的园长（名字想不起来了），走向仍在议论的那些老师，并对他们说道：你们不要再胡乱上纲了，孩子们争抢玩具打闹的事时有发生，大家在看管孩子时要注意及时劝开，预防出事。大家快散了，各自干自己的事去。听到园长的这些话，让我内心暖融融的，当下班接孩子时，我还专门找到她，对她的上述所言表示真心地感谢，还让儿子深深地给园长鞠了个躬。后来，鼻子被抓伤孩子的父亲来了（我印象中他好像姓黄，不知道他在哪个部门工作，过去也从未有过交往），老师把我们找到一起，说明了事情的情况，也告知孩子被划伤后，因觉得不重，只作了酒精消毒处理，并叫孩子过来，让其父看过。我也当面向孩子的父亲给道了歉，并征询地问他有何要求和想法？他很坦诚地说道：刘老师，您别多想。孩子间为争玩具打闹的事常有发生，就划道印也处理过了，没事的。对他的大度和豁达我很感激地向他道谢和再次致歉，最后彼此握握手告别，分别向各自的班组走去。

三、经幼儿园的事件后，面对可能出现的上纲上线议论，相处中的平等原则不复存在，隐忍和回避就代之为我处事的第一原则。但率真直言、争强好胜是我的真实性格，故要我做到这点的的确真非易事，但面对现实的政治环境，我必须很好地改变自己。比如，我反复告诫孩子，不许他和任何小同伴打闹、争抢；当孩子在玩耍中如若受到委屈或欺负时，一般我只能抱起孩子哄哄他，绝不斥责对方，更不去找对方孩子的父母讨什么公道，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忍了！如一次，五连指导员刘启千老师（数学教研室）的女儿（她比小牛要大两岁多）到我家要玩小牛的玩具（为了保证对孩子的教育和智力发展，来干校时，我们给孩子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玩具，诸如惯性或发条动力的汽车、坦克和直升飞

机等)。孩子有个玩伴彼此能在一起玩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每当有孩子来找他要玩玩具时，我都是欢迎的，这次也不例外。但因房间小，我只能让他们在床上一起玩。由于床很高（为便于床下能放东西，故床板架得很高，约70 cm），故我还特地嘱咐他们玩时小心别滚下来，说完后我就到屋外棚子里做我的事情，并不时地隔窗看看他们玩的情况。玩了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听到屋内咣当一声响，紧接着就是小牛哇的一声大哭。我赶紧转身跑进屋里，只见小牛从床上跌落地下正捂着头哭呢。我立即抱起孩子，眼看着孩子的额头右侧鼓起来一个大包，我要给他揉揉，手一碰到鼓包他就哭。我仔细看看，除额头外其他地方倒没事，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我一边给孩子揉，一边说跟你们讲过了，为何还不小心呀？没想到孩子指着那小女孩说：是她把我踢下来的。听到孩子的述说，我很吃惊也很心疼，我转过头去看那女孩，只见她很不自然地低下头继续摆弄着玩具，对是不是她将小牛踢下床的事，什么也没说。面对这一情景，我猜想儿子说的是真话，我只能把孩子的委屈、受欺负的苦楚，统统埋在自己的心里，抱起孩子说道：咱们不玩了，到棚子里妈给你擦把脸，拿冷水给你敷敷。而对那女孩我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只觉得她很不懂事，今后不想再接待她到家来玩了。

隐忍、回避是在法制缺失、社会不公的强权统治下，弱势群体普遍采用的处事原则。尽管这不能给弱势群体自身带来生活上的欢乐和幸福，但起码可以减少或避免灾祸的降临，求得安身立命的可能。总之，这是弱势群体的求生之道，为了儿子的安全和健康成长，我也必须接受并学会这一处事原则，以适应极左政治环境下的社会现实。

三、迫害升级：牛棚中的“最后通牒”

大约于71年4月底或5月初，可能因我的问题长期未能拿下而引起军宣队的愤恨，而决定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置，故决定将我的学习班迁往农村——长田，距校部大约三四公里。在长田村也有部分拖家带口的地院老师租住在村内老表家中，如我系机械教研室黄作宾副

教授和煤田教研室李宝芳老师全家老小就住在长田。

但关押我的地点却不在村子内居民聚居处，而是在村外的一个牛棚中（可能事前略经改造）。之所以选在远离居民点的村外办“学习班”，其理由除表面上的便于管理外，更重要的则是便于他们使用铁腕手段肆意对待手无寸铁的被关押者，而免除被外界察觉的担忧。在此想说明一点，之所以给“学习班”打上引号，一来是因为，这本来就是在毫无法制可言的文革时代，在前面冠以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班实质上只不过是一块欺骗广大群众的遮羞布，以此来掩盖当权者随意关押不同意见者的违法乱纪勾当；二来是，最初的学习班还让被关人员学学被关人员必学的“老三篇”，而此时的我，连主席语录、课桌、板凳等学习必用的课本和器具都不再配备了，世上哪有这样的学习班呢？！所以说，以学习班的名义，干违法乱纪的勾当也可算是文革时代的一项“创造”吧！

关押我的牛棚地处村外的道路一侧，其左前方约30多米处有一公厕，牛棚后面，则是一个很大的水塘。这几乎是江西那一带农村典型的建筑模式，因当时农村的农耕机械还很少使用，农田耕种几乎完全依靠水牛，而水牛喜水，故牛棚边必有水塘，供水牛嬉戏。水塘的后面则为一片树林遮掩看不清林后的真面貌，极目抬头望去，则可见重山叠嶂的模糊影像。道路另一侧则是大片大片的农田。

牛棚房舍的俯视外形颇像俄语字母“Г”的形状，只不过横竖的尺寸大致相当。改装时将一横和一竖间加了一个门，且加装了锁扣，可以加锁把门锁上。同时，在横向房中间又加了个隔断，将横向房分为里外两间，中间这间就变成了竖向房和横向房之间的通道。这样排列的目的是将竖向房间作为关押我的牢房，故可以加锁，而横向房的里间则是看管人员的休息室了。

到长田后，就将我投入到牛棚的竖向房内。房间的面积很大，据我目测约有15平方米左右，而且竖向两面的墙壁都开有不大的窗户，约0.5平方米，但加有直径近3厘米粗的木格栅代替了玻璃，大约是为防止犯人钻窗逃跑吧！只可惜窗户开设的较高，其底沿都超过我的身高，可能这是为防止我凭窗外眺之故吧！面对这一特殊的设计，我在室内只能隔窗仰

视窗外的蓝天了，好在当时的GDP值很低，PM2.5几乎没有，所以没有雾霾一说，只要是晴天，隔窗看到的永远是一片蓝色的天空。房间靠水塘一侧给我安了一个床铺（一副床板架在两条四撇八叉的长凳上），另外在朝农田一侧的墙边，放了一张课桌和一把方凳。这就是牢房里除我的个人行李和日用品外的全部家当。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家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加大对我的惩处力度而在日益变少。起初是撤去了课桌，需要时用方凳代替课桌，让我在方凳上写材料，并代之以一根直径不足20厘米，长度不足半米的园木作为凳子，供写材料时作为“座椅”。继而因不再让我学毛选和写材料了，故连方凳也撤去，只留下一段园木共我当座椅使用。再到后来，就将架设床板用的四撇八叉的两条长凳也撤走了，让床板直接放在凹凸不平的地上。这下可真让我接地气了，所幸还保留了块床板，否则当地潮湿的环境（因牛棚靠近水塘，比一般住房还要潮湿得多）给我造成的身体创伤可能再也难于治愈了。只从这里就可看出，军宣队在抓“五一六”的过程中施虐于人的残酷程度，这些都是后话。

初步安顿好后，又开始了新班址的“开班”训话。专案组的成员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变化，但似乎周某不在内了（也有可能当时还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在了。当我被解除隔离后，始知他已调离地院去福建了），这里我之所以要提到他，主要是在我被隔离审查期间，自始至终，只有黄津生和他两人没有动手打过我。只要在杜某指示或暗示下，专案组成员开始打人时，黄某即刻转身外出，周某则原地不动，没有任何表示。而且，在学九楼学习班时期，周某一直在同一房间内陪住，并且有一次睡觉前，还以平常人的态度和语气劝我说：有问题很快交代就没事了，你看学校里那么多负责人交代后都没事了，你又何必硬顶呢？我从他的语气里知道他说这话是好意，而且也不是以专案组成员的身份在说话，所以，我也很动情的对他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确实未曾参加过“五一六”，我不能瞎编胡说呀！他未再说什么，双方的谈话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它能如此待我，我是十分感谢的。所以，大约在76年底，当高院长找我去他家宣布给我平反时，我曾请求高院长将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一事告知周某，以表明我没有骗他。高院长当时问

我想通知他的原因时，我就上述情况告知。高院长一笑说道：你的要求我理解，但当前还有很多更紧迫的事要做，周某目前在哪还需去查，是不是就算了吧？！面对高院长的解释，我也觉得不要再坚持己见为好，就同意了。而后，高院长还补充了一句话：在学习班里他能私下那样劝你，已经说明他内心的看法了。

训话一开始就非善茬儿。杜某气势汹汹地说道：宋翔雁，你听好。在整个干校，不，在整个地院抓“五一六”的运动中，就属你的态度最为恶劣。你要知道，你的问题是板上钉钉的，即使你不承认也完全可以给你定案。让你自己交代，只不过是为了给你一个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体现党在处理“五一六”问题上的政策。你要知道，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党和人民不会无限期的等待你的觉悟。希望你不要错误估计形势，顽固到底只能是死路一条！接下来，几乎每一个专案组成员都程度不同但极其严厉地狠批我的顽固态度。其中更有甚者的是李鹤忠的批判，他手持一根木棒，凶狠狠地说道：宋翔雁，就你这样的我们看得多了。你不要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不承认我们就没办法了。告诉你，是时候不到，到时候撬开你的牙，也得让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着，手里还舞弄着那根木棒）！很明显，这是一种要下狠手的炫耀。从这些严厉的批判中使我感到此乃近乎爱迪美顿书式的最后通牒，如若再不承认，就会立即定案，并劳改、流放或送监。当每个专案组成员都批判后，按初级班的惯例，接下来的应当是责令我对大家的批判、帮助表态。而每次几乎我都是同样的回应：我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最终一定能还我以清白。为了证明自己，无论是那个人对我的揭发，我都愿意与他当面对质，以便能帮助组织查明真相。正当我仍在准备如何应答时，只听到杜某说道：我们今天想对你讲的话就说到这里，希望你能一个字一个字的都听进去，并且好好想想。我们不想再听到过去那一套千篇一律的应答，给你三天时间，记住，只给三天时间，认真地去想想大家说的话意味着什么？自己要下决心，希望你能和过去决裂，老实交代重新做人。听明白没有？对此问，我点头回应表示听明白了。于是，他们随即退出，并把房门锁上。

四、我的对策

接下来我想的并不是怎样交代的问题，因为，在历时半年左右的初级班里，我已经想过了不知多少遍了，而且，即使从70年7月份算起（因说那时钢铁学院个别人发起成立了以反周恩来总理为目的的“五一六”组织），至今也就四年，如此重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不可能遗忘的。所以，我有十足的把握说，除参加过东方红公社造反组织和事后自动转成红教练组织外，不论是以单独的或集体的形式，我都从未再加入过任何其他组织。在过去的近半年时间里，上述150余字的内容，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也不知写了多少遍。再想、再说、再写也仍旧如此。所以面对今天格外严厉的训话，表明了是对我的管制措施进一步升级的开始，即使我再怎么想也是无济于事的。基于此，我决定很好地利用给我的三天时间，想一想专案组可能对我采取哪些措施迫我就范，对这些可能的措施，我当如何应对，如何化解。面对今天李某杀气腾腾的言论，他们有无可能采取严刑逼供的手段，实施酷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当如何处理？我觉得自己必须冷静地思考，必须估计到最坏的可能，凡事预则立，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因身处于特定的环境下，物质准备是谈不上的！

首先，我清理了隔离审查以来自己的认识（包括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院革委会、专案组有意对我“透露”的某些信息、批斗大会上得知的一些情况等）上的变化和“提高”，通过理清这个思路，也可作为三天后自己对专案组的一份答卷。清理后使我觉得当时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有条理了，这对今后从容应对相关质询也增加了信心。所谓系统、条理就是：“五一六”是一个以反对周总理为目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它成立于67年7月中旬；地院革委会个别成员在唯我独革思潮的影响下，到处支持造反、打派仗，干扰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卷入其中是有可能的。目前贾振远、陆炎德等人承认参加了“五一六”组织就是证明；因此在地院开展对“五一六”的清查是完全必要的；面对清查过程中近半年来对我的审查，我是积极配合组织将个人情况做了如实交代的，并真心希望通过审查还我清白。就这一认识而言，重要的一是时间节点，即71年7

月中旬，那也正是我即将结束简报组的工作，并因病开始全体的时间，这一事实是专案组无法改变的；二是定性，即“五一六”是阴谋集团，这就决定了，一来其活动不可能是大张旗鼓公开造势地进行，二来成员不可能很多，也不可能一窝蜂似的发展起来。要发展也必然是从上向下逐步的进行，而且必然有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首先要吸收的也是一些中上层要害部门的负责人，拿现代语来说即大约只能是精英们才有可能被首先吸收，然后再及其他。正因此，我对当时地院有那么多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深感内中有诈，觉得必是有人想把水搅浑，好金蝉脱壳。当时最令我生疑搅混水的人就是陆炎德，但鉴于陆已被军宣队列作样板，我不便直接去揭露，只是在交代和回应质询时，我反复强调愿与揭发者当面对质（因专案组曾透露过陆、钱等人揭发我是“五一六”）。我深信若能与陆当面对质，我定能驳得他体无完肤，我有这个自信！

其次，当确认自己从未参加过除《东方红公社》（含“红教练”）外的任何其他组织后，我也回顾了自己坚持的底线（或原则）：实事求是——有则有、无则无，接受并配合组织的审查。而不能采取许多党内干部在面对党内残酷斗争时采取的惯用做法——在高压下或美其名曰从党的全局利益考虑，违心先承认，过关后再翻案或等待中央纠偏时，甄别落实的做法。之所以不能采用这种办法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不具备党内干部，特别是那些有相当政治阅历的中上层干部的政治资本。对这些人的处理，还需考虑到他们过去的贡献、目前的影响，故有相当的回旋余地，相对讲会比较慎重，且甄别、翻案随时均有可能进行。相反，仅只是一名处于最底层的普通白点教师，一旦违心承认并定案后，要想获得甄别纠偏的机会都少而又少，翻案更遥遥无期，而且很有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再有人过问此类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如此，不仅会影响自己，更会影响到孩子的前程。而确保孩子有一个和所有人一样不会受到家庭出身影响的成长环境，恰恰是自己长时间来坚持不违心承认的重要原因和动力所在。经过这番考虑，我确认自己的信念和坚持是正确的，今后再怎么压也只能继续坚持。当然，这样作肯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一方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和家人团聚、不能给家人分忧；另一方面，个人的身心会因此遭到更残酷的对待，会因

此承受更大的肉体上的苦痛，对身体也将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我觉得，这一代价只能由我来承担，决不能父债子还！我甘愿自己承受这些苦痛，也绝不违心承认后而转嫁给孩子，让他因父亲的过失而背上沉重的出身包袱。

再有，面对可能出现的施虐和人身迫害的加剧应如何对待。因施虐、迫害的主动方完全不受我的左右，故作为承受方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如何应对方能使对已造成的伤害减至最低程度。针对此前学习班经常采用的施虐和迫害手法诸如不让睡觉（疲劳轰炸）；限量喝水（减少外出解手的次数）；长时间不给提供洗澡、洗换内衣用水或不让外出小溪处冲洗；长期只提供食堂制作的最低档的菜肴和主食，进入学习班后，从未吃过肉鱼之类的食物，即使节假日期间亦如此；除外出参加劳动和如厕外，平时没有放风时间等，我曾采取过一些应对办法，收到过一些微弱的效果但十分有限，如疲劳轰炸、食品营养等就只能听凭专案组摆布，基本无法应对。而今，随着学习班的升级，施虐和迫害必将加剧，应对考虑更显重要，即使效果甚微也不可让自己处于完全被动甘愿承受的状态。为此，我决定采用以下几条办法加以应对，并以此来保护自己：1、利用中央政策和毛的语录对抗施虐、施暴和迫害，进行合法斗争，制止迫害、捍卫自身权利。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抗争（后来因收缴了我的纸笔，只能在每次施暴时用口头方式了），让施暴方知晓我的态度：接受并配合审查，但拒绝违背政策和主席思想的迫害。让对方知道，我是懂得相关政策的；2、向专案组成员提出要单独找杜某“交代问题”，借此对发生的违背政策的迫害事件提出看法和抗议，要求他立即向军宣队汇报实情，制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通过这种方式，可起到让杜某知道一旦出现问题，他将承担渎职的责任；3、在事态严重危害自身安全时，以要求面见蒋喜亭“交代”为由，上告专案组迫害违纪的严重事实，求得上层领导的直接干预。当然，我深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在蒋某人的默许下发生的，告发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我深信蒋某面对违反政策和毛的教导的诸项事实，绝不敢妄言那样做是合法的，只能回避或假意答应查清后再回复的手法来拖延，甚至不了了之。但即使这样，也能让专案组违纪成员有所压力，短时期内不敢继续恣意妄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越加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身心的自我调理尤为重要。我深知，面对残酷而又无休止的迫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受损伤是不可能的，但如何把这种损伤降至最小，则是我必须加以注意并努力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妻子和家庭，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要负起自己应负的一个男子汉责任，面对逆境决不颓废。为此，今后唯一的办法就是有针对性的加强身心的自我调整，而别无其他选择。面对训话时李某手持木棍不断舞弄的凶相，我料到在远离居民点的村边的山沟沟里，专案组成员动手打人的现象在所难免。但对此决不能再采用68年初夏时对付岳母家邻居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办法，因为这时打人者身披专案办案人的合法外衣，他们俨然成了共产党的“代表”，执行着“党的指示”，因此绝不可公然与之抗争，而把自己置于了“反党”的地位。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利用党的政策和毛的指示，和他们进行合法的斗争，让他们找不到借题发挥的把柄进一步施害于人。这也就是我常说的：共产党的牢房是最难坐的道理所在。即明知他们并不是真正代表共产党的人；也明知他们执行的并不是公开见诸报刊和文件上的中央政策和毛的指示，但你还得违心的承认他们是共产党派来“挽救和帮助”你的，因此还得按此原则自缚手脚地去艰难应对。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意欲施暴打人，挨打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这时就要求自己全神贯注于施暴者的动向，面对来袭能做的只能是能躲就躲，能挡就挡（尽量躲过棍棒、躲过前胸和头部等要害部位挨打；尽量用四肢接招来抵挡）。同时，尽量向其他专案组成员身边靠近，以避免其大力挥棒打人的可能（因担心误打）。至于是否会出现如李某所言的，“撬开你的牙”之类法西斯式的严刑逼供，我思索后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国家专政机关的监狱或拘留所，想要施刑，但他们一来没有相应的施刑器具，二来也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施刑人员。何况，他们是打着办学习班进行专案审查的旗号行事的，在非法逼供上多少还是会有所限制的。但我也有万一遭受刑具逼供的思想准备，即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咬牙挺住，而不能失守自己的底线屈打成招，给孩子的前程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对酷刑下人体的痛苦状况，从中外文学、电影的描述中给过我极大的震撼，如小说《牛虻》、《红岩》等，

但我相信，若自身这次也不幸落入此种境地，为了自己后代的前程，我也定能挺住。而且，我已想好，即使到那种地步，也决不轻生，绝不落下个畏罪自杀的恶名，因这同样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总之一句话，在干校以致地院揪斗“五一六”的运动中，我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拒绝违心承认的精神支柱所在，并非来自什么“伟光正”的理论或其他崇高信念，真实的精神支柱一方面是个人的性格的使然——认理而拒绝强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儿子，让他的未来不因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而受到影响。现在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自己思想深处缺少来自所谓“正能量”的崇高信念做后盾，因此才最终没能坚守住实事求是，不违心承认的底线，而向强权屈服投降的吧？！在注意身心调理中，抗打压、施虐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常的思维活动、语言功能、肢体关节和肌肉等方面的训练，以及孤独感的排除等任何可能因用进废退原理而导致的生理功能的衰退现象，都应列入其中。目的就是届时既要确保自己能够活着走出学习班，而且一定要以一个各方面基本上正常（精神、思维、语言、肢体等）的健康人那样走出学习班。因为在我的生活理念中，人不是单纯为活着而活着，只如此则与动物无异。人只有为他人（含自己的孩子和亲人）的快乐、幸福而活着才有价值和意义。要想做到这点，就必须确保自己各方面的生理功能不会因学习班里的非正常生活环境和所遭遇到的迫害而出现衰退。

经过三天近乎没人打搅的思考，我内心就基本平稳下来，觉得今后一段时间内，无外乎就是再多受点罪，只要自己应对得当、自我调理得当、对路，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而且这三天里，在管理上尚未见有何特殊的紧缩，如外出上厕所、喝水、盥洗等基本与过去无异，当然，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对方想借此表达为了让我好好想一想，已经尽力给了我很好的条件，一旦后来看我仍然“冥顽不化”，则会加倍地还以颜色，这是自己要有所准备的。在此期间，我利用如厕的机会，在来去的路上仔细地观察关押点的周边情况进行了观察。但这种观察仅仅是借机让自己陶冶于自然美景和田野风光之中，让自己获得一种“拥抱”大自然的满足而已。因为眼下的我，太需要在和大自然的亲近中，享受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了。但一次从公厕出来时，我发现在环绕水塘的树丛后面（即关押我的牛棚旁

的水塘后边)，有一群人来回走动的身影。但他们很明显不是农民，而是一身干部的打扮，估计也是干校的人员，因距离较远（直线距离起码在百米以上），只能看出模糊的移动人影而难于分辨。回到屋内后，我想，很可能在此办的学习班不止我这一处，那边很可能也有一个学习班，否则不会有干部模样的人群在此人迹罕见的地方来回走动。而且，我估计那边很可能同样也是一处弃用的牛棚经改造后用来办学习班的。

五、施暴与抗争

三天后的第一次对话开始了，杜某一开始就说道：给你三天时间想得怎样了？说说吧。我随即将自己想的第一部分内容——隔离审查以来自己认识上的深化、疑问和态度做了系统的汇报。当我说道在唯我独革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地院革委会的个别领导人加入“五一六”集团是有可能的，现已交代的贾振远、陆炎德即是例证。因此，在地院清查“五一六”分子是完全应当和必要的，此言似乎还得到杜某等的认可，只见他们在频频点头。但当我说道：既然“五一六”是一个阴谋组织，其成员就不可能很多，但从告诉我的情况看，地院从上到下已有很多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这有些令人生疑，是否会有人借机想把水搅浑？这时就有人忍不住发狠地说道：你竟敢怀疑军宣队偏听偏信，好大的狗胆！对此，我不等其他人再欲上纲上线设置圈套的发问，就立即平和地说道：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告诫我们，历次运动中都不乏有人搅浑水借以逃脱，否则也就没有“漏网”和“补课”一说了。故不应认为要警惕可能会有人想搅浑水的看法等同于怀疑军宣队。这时杜某插话说道：先听他把这几天想的都说完后再做评论。看来我及时作出回应还是对的。当我继续说道，我认真仔细地审视了近半年来对我的审查，我始终认为对我的审查是必要的，既是对我个人的历史负责，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半年来，在这一态度指导下，我积极配合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实事求是地系统地回顾和交代了从文革开始到来干校以前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特别是67年7—9月的那段历史。因这距现今仅三年有余，在这

段时间里所接触和参与的事，经反复回忆可以说已非常清晰。我可以坦诚而负责地对组织说：我确实没有以任何形式、经任何人介绍参加过“五一六”组织。因专案组曾向我说过，钱天宇、陆炎德等不仅交代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还揭发了我，说我也是“五一六”分子。所以我也很认真地想过与此二人在文革期间的关系，并写成了材料，交给了专案组。说明了他们的揭发有误，并指出文革开始至今，我与陆某从来没有过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即使一起参加过一些会议，如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讨论、去人大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及事后大家一起核对记录等，也是很少很少的。只是来干校后，因我们的床位相邻，故睡前或起床后有过一些简短的交流，但因彼此不在一起劳动和学习，所以交谈的内容也很一般，而且也从未涉及过文革方面的事情；同时，在材料中我也将与钱天宇老师的关系和在文革中彼此间的交往情况如实作了交代。材料中特别指出了，当步行串联我从兰考回京后，直到来干校以前这段时间里，即1966年12月底至1970年1月之间，我们彼此间再无任何交往和联系，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说我是“五一六”分子？！但为了能尽快搞清我的问题，我真诚地建议，能让我与他们二人对质，如果还有其他人揭发，我也可以和这些人一一对质，以便尽快做一了断。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再次对专案组并请他们向军宣队转知：在今后的审查期间里，我将一如既往，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本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教导，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同时，我也相信军宣队会根据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一贯政策，对相关的揭发材料做出进一步的核实。我深信自己的问题最终定会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当我将三天来的思考做了以上的陈述后，一开始没人说话，或反驳、或肯定、或敷衍，沉寂一会儿后，杜某开腔说道：你以为你现在的态度就是配合组织调查吗？再这样下去，你会越走越远的。给你办学习班的目的是让你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而不仅仅是一般地向你调查某些不清楚的问题，这点你不要搞错。同时还要向你指出，你只有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转变立场后，才有可能配合组织对相关问题进行的调查。同时还要告诉你，不要想通过对质来摸底，组织上对他人的揭发也是经过调查后才确定真假的，我们说你的“五一六”问题是板上钉钉的不是在唬你，你别以为通过拖的办法就能改变这一事实。你若想

拖延，我们也会有对付拖延的办法，我们是不会听由你来摆布的。我们会进一步研究你今天的汇报，并向军宣队领导请示。对你的问题要采取哪些措施明天再向你宣布。说毕就示意其他成员一起出去了。

对陈述后没立即遭到批判而冷场，对再请示后宣布对我的进一步措施，这均出乎我的预料。我原准备说完后就会遭到狠批，并进而动粗。若此，我会进一步根据政策说理抗争。而今宣布后即散去，只能说明，我的陈述也是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故进一步的办法只好另行研究再定。但我思想上没有天真地会认为他们会就此罢休，相反，却更增添了我的警觉。既然他们认为已板上钉钉，那就有可能按钉钉的材料做结论，该捕、该监将立即发落。这样，我的问题最终就只能到专政机关去解决了。如此则“祸福”难料，但我的基本态度依旧不会改变，至于如何应对，只能视情况的变化再定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是难熬的，是继续在干校接受审查，还是转至专政机关处理，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最终，我认为即使要想宣判并转送专政机关收审也不会自明日就开始，因要想送监还需有一个报送和审批的过程，绝不是军宣队想送就能送成的。而在这种准备移交前处理的特殊情况下，凶险的变数就会很高，这倒是自己要特别小心应对的。想到此，内心也就少许平稳了一些。

但今天情况的变化也让我感到似乎我的问题已经进到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般的困境之中，即军宣队和专案组认定我的“五一六”问题已经板上钉钉；而我本人则认为，我不是“五一六”，从未参加过该反动组织。而且，不论从“五一六”组织成立的时间节点和我离开简报组的时间、因患病全休的时间三者对应来分析；或者，从我个人的出身、政治面貌、当时在造反组织内的职务等诸方面的条件来看，我被吸收加入“五一六”组织的可能性，也能很容易得出不可能吸收像我这样的人加入“五一六”组织的结论。但为何军宣队就不肯接受或考虑我所提供的上述情况，以及我所作出的相关分析呢？为何又拒绝我提出来的：为澄清真伪、再做进一步的查证，以及我愿意与揭发者对质的请求呢？甚至专案组还把此斥之为我想摸底呢？而且。既然已经板上钉钉，摸底又有何用呢？面对这些我自己也难于理解的困惑，所以我认为自己的问题已成死结，在军宣队根本不听我的申诉情况

下，前景不容乐观，只能等着最后的宣判了。基于此，我究竟如何处置更好呢？想想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公开宣布说：既然你们不愿听取我的申辩和分析，对我的交代、解释，一律斥责为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那我就不再说什么了，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其二，仍按过去的办法呢，不管你们听还是不听，该怎么申辩我仍怎么申辩，直到你们宣判。而且宣判后，我还要继续申辩下去。长考之后，我的心逐渐坚定起来。那就是，我要选择后者。要像一名战士那样为真理坚持去战斗，而不能像囚徒那样消极认命，等待死亡。但需铭记的是，在共产党（或说是打着共产党旗号）办的“监狱”里，要抗争、要战斗，必须要按党的政策、毛的教导，摆出一副接受审查的姿态来进行。这里用得着鲁迅先生说过的：辱骂和恐吓不等于战斗。不能通过谩骂或其他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和鄙视，既要坚持积极的战斗姿态，又不能授人以柄。要坚定自己的立场，把自己摆在：我是好人，现受诬陷，接受审查、等待结论的位置上。想通这一切后，我的心情也顿觉轻快，对今天的思考过程和最终里出的头绪，我是满意的，这时仰头斜视窗外布满阴云的天空，倍觉人生历程的苦涩与艰辛，但阴云之后难道不就是阳光璀璨的蓝天吗？！

第二天如约对我的批判和所谓“宣布”按时开始了。杜某一开始就说道：我们昨天将你的汇报和情况如实向军宣队作了汇报，经研究后认为，历经近半年时间，你自始至终无视我们对你的劝告和广大群众对你的批判、帮助，把目前对你的管理、帮助视为我们的软弱。所以一直以来，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还企图以积极配合组织调查，愿和揭发人对质等美好言辞，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冤枉的好人，抱着幻想试图蒙混过关。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早在决定给你办学习班时就已基本查清，而且已经达到了完全可以定性处理的地步。今天之所以还把你留你学习班里继续审查，目的并非想从你嘴里再多得到些什么，如今已有那么多人作了交代和揭发，你的交代还能比他们的总合都多不成？！所以，你要看清当前的形势，现在已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抓住了，你就能像其他已经交代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人那样，回到人民内部中来，否则只能落得个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下场。同时还要告诉你，你别想把学习

班当成你的休养所，还有好几个人侍候着你。从今后，我们将加强对你的管束，促使你尽快转化。杜某虽然没有明说从哪些方面加强管束，但我心知等待我的必定是迫害程度的进一步升级。

杜某训话后，其打手李鹤忠就开始发威了。他吼道：宋翔雁，你站起来听好了！对他的呵斥我未立即回应，于是，他立即挥棒从左侧向我侧身打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即刻屈身前倾左手随即操起坐凳，双手握住蹬腿，迎击他挥来的棍棒。只听哐当一响，他的棍棒脱手被挡出去落在围坐着的他人脚下。与此同时，我义正词严地地问道：杜展凯，学习班里你怎能纵容手下打人呢？这符合党的政策吗？面对我的质询，杜某一时语塞，他人立即出来替他解围道：让你站起来听，你为何抗拒不站？这时我也毫不相让地回道：什么叫抗拒，我只是回应慢了而已，难道这就是李鹤忠打人的理由吗？原本因打人的棍棒没有握住反被震落在地，而搞的有些灰头土脸的李某，这时有点缓过气来的说道：对顽固不化的敌人不但要打，若敌人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毛选上没说过吗？！对此，我毫不客气地回答道：毛主席说的“打”是指双方士兵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的打仗，而不是让你在学习班里手拿木棒气止颐使地随便打人！面对我毫不退让的态度，杜某似乎觉得继续这样争论下去，他们未必能占到上风，而且反倒会更让我得理不饶人，不利于以后的管束。故他又说道：宋翔雁，你的态度好嚣张啊，不要以为你多念了几年书，有本钱可以强词夺理了。告诉你，今后你若不服管束，专案组的人，有权采用任何措施加以处置。我注意到他的话语中，有意回避了“打人”一词。所以当他说完后，没有等他再问我听明白没有，我就立即接着说道：对符合党的政策的管理措施，我会坚决服从。但我请求专案组能将今天发生的事向军宣队领导汇报。杜某接着耍了个滑头，含糊地说道：你在学习班的情况，我们每天都要汇报，不用你来请求！就这样，专案组在学习班里第一次想施暴打人的企图就在我按党的政策据理力争下化解了。但我知道，这更会引起专案组特别是恶棍李某的不满，他们还会借机引发事端，制造打人机会，我必须对此有所警觉。但这件事也说明，面对公开发表的党的政策和毛的讲话，他们即使想违背，也需找借口作遮羞布而为之，故今后当遇

到对方施暴时，这就是我与他们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尽管我只能处于防守地位，但总比束手任人宰割要好。

此后每逢学习班要我交代，施暴、施虐均成常态，如经常让我站着听他们没完没了的训话，而且时不时地以纠正我的站姿为名，挥棒打人（如我单腿站立成稍息状，就会用棒打放松的腿，令我站直了）。大约十月以后，原来室内配置的方凳被一段原木（直径不足200厘米，长度不足0.5米）取代，从此每次学习班开会，我只能站着听训。但人在久站的情况下，重心在两腿间转换是正常的体位调整，以保证站立时间。但施暴者竟然不允许这种调整，猝不及防的一棒打来确实很难防范。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为了取得施暴效果，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了。在一次这类施暴中，李某一棒挥来因躲闪不及恰好打在我的左腿脚踝上，疼痛难耐令我当即屈腿跪地。我提起裤腿退下袜口，只见踝骨处外皮翻裂出血并肿起，令我怒气难耐，我踮脚走向李某，他们因不知我的意图都站起来吼道：宋翔雁，你想干什么？！我也毫不含糊地大声说道：我要抗议，我要就医！我深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我不能以牙还牙，而必须有理有利有节，不可陷自己于被动之中。我及时控制住自己难耐的怒火，但我必须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还以颜色。因此，我趁李某迟疑之时，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木棒，他们以为我要打人还击，一起上来想抢木棒，但我提着木棒让其一头着地，就势用另一只脚将木棒踩为两截扔在地上。并接着对杜某说道：你们尤其是李鹤忠借纠正站姿为由屡屡打人，这是违反政策的，现在我要求就医，但现在我走路有些困难，请你们考虑安排。说完我不等他们的允许，就势在他们坐的椅子上坐下，并提起裤腿退下袜口让杜某等人查看伤情。面对此情况，杜某等不好立即表态，只见黄某示意杜退出室外再作商议。稍后，黄津生进屋告知：因你走路不便，我们已派人去校部请医务室来人给你处理。今天的情况实属意外，因你长期来拒绝大家苦口婆心的劝告态度，引起众人不满是直接原因。今后你必须改变态度，我们也会注意。黄是调干生，文革前是设备科的一名科长，现是学习班的副组长，但自始至终从不参与对我施暴的打人行动。我理解他的态度和难处，所以我不想和他争论，更不想反驳他，在施暴中他能保持理性在当时就很不容

易了！所以我没有再多说什么，也不做解释，只是对同意派医务人员来此看伤情表示感谢。

当日下午校医室来了一名护士，估计事前专案组成员已经与她打过招呼，所以她查看时什么话也没问，只看伤情，给伤口处作了消毒处理，并在纱布棉上涂抹了一层黑褐色的药膏，贴在我肿起的踝骨上。处理后，她留下了一盒黑褐色药膏和三四片纱布棉及少许胶布条。还留了一小瓶酒精和一小包棉签，让我一天换一次药，说毕就收拾她的医疗包准备回去了，在她退出房间前，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在护士处理的过程中，专案组始终有人在旁边守候，大约是防止我借机向外界透露什么吧！

在这次事件中，我之所以特别针对李某的行为抗议，原因是，我并非歧视他的右派历史，而是一方面这类人往往会因个人的历史污点，在以后的运动中会比别人表现的更左、更激进。每次施暴打人他都属于出手最多打人最狠的一位就是例证；另一方面，其他打人者用的都是直径一两厘米的竹竿，而他用的则是直径三厘米左右类似武术队使用的棍棒。前者因有较大弹性，打人时因着力时产生形变而缓解了其击打的力度，而后者弹性要小得多，打在人身上则是实打实的，极易造成对被击打人的伤害。这也是武术人员使用棍棒而不用竹竿的原因所在。

此后一小段时间内，借故打人略有收敛，但施虐力度却明显加大。我想可能是想把杜某人说的“休养所”彻底改为牢房吧！最恶劣的改变是：1、不再允许出外入厕小便，而让我住的房间里尿于脚盆内，第二天如厕大便时再倒掉。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专案组改用攻心战术时，才允许我外出去公厕小便；2、撤掉桌子和凳子，只给一根短木桩，因直径不足20厘米左右，只能横放在地面坐在其上。久坐其上则双腿发麻，屁股因坐在曲面上，时间也不能很长。为了缓解长久低坐造成的腿脚麻木，我不时将园木竖起，让臀部的一侧坐于其上，过一段时间后，再换另一侧臀部来坐。只有当让我写交代材料或总结自己这阶段的认识和“活思想”时，专案组才给提供桌子和凳子，一旦材料写完并上交后，桌凳也就随即撤走；3、饿饭。在学习班内，历来吃饭由他们去食堂代打。吃什么、吃多少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但过去饭量还能基本保证一日一斤的定量（我的定量是32斤/月），但自从

加大施劣程度后，经常一顿饭的主食只有一个馒头（2两）和相当于二两量的米饭。加之每顿打来的菜都是熬南瓜、空心菜一类的素菜，几乎从未给我打过荤菜。因此久而久之，饥饿感日益强烈，为此我曾多次要求专案组能按我的定量标准提供主食。但几乎每次均遭拒绝，而且还厉声说道：你要想享受、多吃，那就赶紧交代！对这种任意践踏国家粮食政策、克扣个人口粮供应量的行为，我懒得与他们争辩，因我知道简单地争辩达不到目的。

于是，我后来连续十天记下了每天提供的主食类别和数量，得出我每天主食的食用量是六到七两，即使按高值计算，每月实际给我的主食量也只有二十一斤。有了这个数据后，在一次例行的训话会上，我正式对杜某等提出：请向军宣队领导反映我的口粮供应被恶意克扣和要求按标准提供主食供应量的要求。而且我还进一步指出：每个干部的口粮供应标准是国家规定的，任何人无论用什么理由克扣都是违法的。面对我提供的数据和申辩，包括曾以“赶紧交代”为由不答应我请求人在内，均无言以对。但杜某仍然诡辩地说道：你的要求我们会反映，但我必须告诉你，你的粮是定量我们一两也没有克扣过。对此，我当即反驳道：你能如实反映就好。但我说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们向我提供的主食供应量远远低于我的粮食定量标准，而不是指你们克扣了我的定量标准。口粮标准是国家粮食局制订的，任何个人和其他部门都是无权改动的。面对我的反驳杜某未再争辩，但这次交锋后，我的主食供应量有了一定增加，尽管分量依旧不足，副食仍然是熬菜类的素菜。但我知道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根本改变掌权者的施虐状况是不可能的，依据政策维护自身权利也只能适可而止；4、撤去了支撑床板的长凳，让床板直接坐落在地面上。因南方原就潮湿，加之牛棚原就建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旁边就是水塘，就越发潮湿，而到入冬季节，因室内不提供取暖炭火则更显得阴湿寒冷，令人难耐。面对这种居心叵测意欲损伤被囚者身体健康的卑鄙施虐措施（含不给坐凳），我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抗争，只能自己默默忍受，并通过自身调理（如活动四肢、全身搓擦、室内走动等，但这一切都要在不被专案组成员看到的情况下进行）尽量减少其对身体的伤害。■

【资料】

1957年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吴美潮

1957年6月13日下午，在上海交通大学徐家汇本部的学生第8宿舍201室，即作者蜗居处，除了本宿舍的几人外，还来了几位外宿舍的同班同学。大家对交大院系调整和迁校等有些看法，商讨是否应写张大字报？一致同意要写，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提供口头草稿，并公推由我执笔，同班同学姜震元进行润笔补充，据说最后一句为过军先同学所拟，由书法最好的庄天戈同学抄写到大纸上，黄子光同学（已故）自告奋勇拿到容闳堂（总办公厅）北门口张贴。这是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它的全文为：

追溯历史良伤感，展望未来当努力

“理工一家”本是交大优良传统，却被院系调整机械割立，好不痛心。

“人材济济”原为我校雄厚基础，苦为宗派主义东调西迁，大损元气。

“汽车”开往长春，然，“清华汽车”原封不动。

“电讯”拍到成都，而，“南工电讯”屹然兀立。

造船工程系独立，如折一臂。

南洋机电院另建，更无必要。

痛哉！领导之软弱。

惜哉！母校之支离也。

亲爱的同学：破官僚主义必须坚决斗争，怕啥静默无言？

尊敬的党委！行上级指示理应独立思考，因何惟命是从。

团结一致，挽巨星之将陨！

万众一心，振欣欣以向荣！

电器四一群护校者

57. 6. 13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读者颇众。继之，各种大字报风起云涌、铺天盖地而来。甚至贴到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小轿车上，当时杨部长为处理交大迁校而长驻交大。1957年7月，反右派运动开始，我和姜震元均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有人认为，一张小小的大字报，打破了‘静默无言’，掀起了‘护校’鸣放高潮，保住了在上海的‘交通大学’这块神圣的金字招牌。 ■

【资料】

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大事记残篇 (1966--1967)

梁幼志编

一九六六年

六月

11日，大字报集中到党委书记周天行身上，赵如璋在传达新市委吴德报告时，暗示院党委属于第三类（十六条中指出干部可分四类）（蒯大富《清华五十天》页314）。

20日，北航工作组召开紧急扩大会议，指出有人想赶工作组走，一定要查出来。（出处同上，页322）。

21日，3511班学生石兴国贴出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该大字报和其他怀疑工作组的言论引起全院辩论。

22日，北航工作组召开大会，宣布石兴国的的大字报是反动大字报，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反动的，连日组织全院进行辩论、批判。（出处同上，328页）

27日，北航全院大会，赵如璋传达李雪峰的报告——抓游鱼、反干扰，提出石兴国的的大字报是毒草，要求通过三至五天的辩论，弄清是非，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出处同上，332页）

七月

5日，北航各班总结就石兴国大字报开展的大辩论以来的运动情况。不少人检查自己的错误，被追查主观动机。约有五分之一的师生被整黑材料。各基层单位对师生进行排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的占十分之一，五千学生中，约有近五百人排为四类分子。近一千人排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类分子。（出处同上，338页）

29日，被工作组压得最厉害的是石兴国（比韩爱晶高一年级）和曹伟康二人参加了人大会堂举办的北京市文革积极分子大会。

八月

3日，多数派红卫兵总部成立，发表宣言和纲领。（同上，360页）

10日，师生四百多人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反映情况，坚决要求赵如璋返校检查。此后又多次去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三座门军委接待站反映情况。坚决要求赵如璋返校检查。

15日，在工作组组长赵如璋的检查会上，支持工作组的文革会组织师生游行，邻近院校人员前来参加。（同上，368页）

8月18日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

8月19日，田东贴大字报公开号召成立北航红旗，许多班级的红旗自发组成。大字报区到处可见红旗符号，在没有总部的情况下，北航基层已经是红旗招展。北航学生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军人家庭。红旗战士出身几乎全是红五类，因此血统论在北航红旗也有影响。我们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班系院三级一层一层选举，每个

系推举两个人到院里，加上教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二十个人，形成核心，开会时，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活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发挥每个红旗战士积极性和创造性，石兴国提议领导机构不采用司令部制，实行勤务员制。各系红旗战士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系勤务员，由他们组成院级领导机构总勤务员站。勤务员只有分工，不分次序。没有明确过常委也没有明确过一把手二把手，石兴国主持全面，韩爱晶在校外。

8月20日北航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这是一个由下而上上下下结合，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最早的红旗战士是屠海鹰、匡正方、张依立。

25日，少数派学生，主要是几天前成立的“北航红旗”成员，根据与工作组组长赵如璋的约定，上午按时来到国防科委门口等待与他见面澄清问题。赵如璋言而无信，让人出来说自己在开会，直到天黑。赵如璋也不出来。学生无奈，在大门外空地上静坐。（同上，380页）

26日，“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学生继续在国际科委门口静坐，要求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出来澄清问题。说明为什么整学生黑材料，为什么把一千多学生排队为四类分子。学生们的自发行动转为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持久战，韩爱晶和屠海鹰等形成“红旗”领导核心。（同上，382页）

27日，约二百名“北航红旗”成员在韩爱晶、屠海鹰等带领下在国防科委大门外一业余体育训练馆安营扎寨，日夜等待。坚持要求赵如璋见面澄清问题。后北京三十九中的老红卫兵和西城纠察队先后动员几十人到一两百人的队伍，冲进该训练馆干扰和示威。北航校内辩论红旗在科委的行动，红卫兵、赤卫队通过大字报广播、辩论等，说“红旗”冲击国防科委、冲击军事机构、静坐绝食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是反革命行为。

30日，“红旗”每天在国防科委附近贴大字报、大标语，要求赵如璋履约澄清问题，并未提出批斗他的激烈要求。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向林彪报告，说“赵如璋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情况，请求指示，均得不到答复。听说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委门外静坐，毛泽东说：不要怕，不要让学生

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坐上三个月。

九月

21日，毛泽东针对北航红旗要求工作组组长澄清问题一事，指示说：“要谈”。林彪说：“赵如璋再不出来，派一个排解放军把他押出来！”

23日，赵如璋在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保证书上签字，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二十八天的斗争结束，赵如璋与学生见面做检查，罗舜初与学生同吃同住，建立了感情和信任，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十月

4日，北航红旗又搞了一次普选，产生五个常委，韩爱晶，井然（井冈山）田东、仇北秦、杜玉荣。明确韩是第一把手。勤务员、总勤务站的名称是石兴国发明的。

同日，北航红旗取得部分广播权利，次日查封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

6日，北航红旗和首者三司发起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江青和张春桥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张春桥宣读《紧急指示》，各校代表讲话。周恩来讲。宣告过去对一些革命同学的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严重事情，一律平反。韩爱晶请蒯大富宣读北航红旗起草的大会誓词。

一九六七年

一月

21日 北航红旗在文化部贴出大标语“文化部大权必须掌握在真正革命派手中，质疑“一·一九”夺权。

三月

24日，清华庆祝毛的湖南农民发表四十周年，北航红旗等校来庆贺。韩发表讲话：今天像一个盛大的节日，确实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

者，不要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世界上插遍毛思想伟大红旗的日子终究是要到来的……

六月

11日，陈伯达与韩爱晶座谈，然后到主楼见群众，其后全校讨论。

七月

1日，北航院系两级革委会全部宣告成立，院革委会发表了《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决议》。

7月3日，中央新闻广播陈伯达签发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北航复课闹革命。

从1967年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航南操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会是大会批斗彭德怀的“揭幕式，是经中央文革正式批准（实为授意）的”。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

八月

11日下午，在北师大，彭德怀被夹在大卡车上游斗。用巨手猛压他的头颅的，是外语系的董连猛，井冈山二号头目。当晚19时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批斗”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战斗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

【读者来信】

1. 冯科臣读《记忆》感想两则

在《记忆》第190期发表了谢甲林老师的文章《北大保卫组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一文，文中谢老师详细介绍他参与的保卫组在北大的活动，虽然文章是针对舒声和郑实的两篇文章展开的，但却是非常能给大家带来思考的一篇文章。

谢老师作为当年参与保卫组的负责人员，用亲身经历过的行动介绍了在1966年他参与北大保卫组后事情的详细经过，并说明了前面两篇文章依据的材料《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的谎言》的背景，这恰恰显示了当事人访谈对历史事件研究的重要性。应该说《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的谎言》的文章和谢老师的经历都是历史事实，那篇文章不是郑舒二位老师捏造的，而谢老如同他最后在文章中说的，以事实为根据的习惯，也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介绍经过。同一篇文章、同一个事件从不同角度看来，却非常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果不是舒郑两位的文章，谢老师的文章可能也不会产生，而对同一件事情的研究和看法可能就失去一次更深入的机会。

记得多年前，一位整理口述历史的老师感慨过，她带领的团队在采访同一件事情的当事人时，发现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决定把她们团队采访的材料在经过当事人重新审定认可的情况下，完整的刊登出来。而恰恰由于这一种做法，让读者对事件的了解更加立体。

每个当事人的背景不同、脾气不同、甚至看到的东西与当时甚至过去对事件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但角度宽广了，对历史研究和细节的澄清是非常有帮助的。■

《记忆》第190期宋翔雁老师的文章后面附上了妻子的回忆“作为五一六分子的家属”一段，那是非常精彩的段落，不仅提供了在同一时间和环境下双方的感受、想法和境遇的

对比，更使事件丰满起来。作为读者，读到最后写春节前夕带孩子的那一段，眼泪几乎掉下来。

李晶和李盈写过一本北大荒下乡知青的著名作品《沉雪》，这部作品曾经获得台湾大奖。宋老师夫人的文章可以和《沉雪》媲美。那一大段回忆中，控诉等成分非常少，即便是对心理的描写也没有太多哀怨，没有那么多哀伤或者愤恨。写带着孩子盖草棚，为了让宋老师知道母子近况而带孩子去手扶拖拉机上玩耍，给孩子准备新衣服，春节假期带着孩子去割草，因为湿了衣服打孩子屁股。这些日常生活和《干校六记》异曲而同工。

在一个时代大洪流中，卷入时代的人的生活，日常的日子怎样一天天过，过日子的人怎样面对。在整个回忆中出现这样的篇章，力量丝毫不弱于同时期受影响的人的压力和挣扎。在那样的环境下，可贵的人性仍存在，人对美好的向往没有丢失，这也和《记忆》的主旨如此吻合。为宋老师的经过唏嘘的同时，也为宋老师夫人的坚强和母爱而感动。■

2017-8-23

2. 郑大同谈高校专辑

我是八零后，进入校史馆已经四年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学校以前出的校志、各年级毕业生名录，历届校长书记的讲话、报告，近百来来的有关学校的照片，以及校友们写的纪念母校的文字材料。

为了纪念学校的五十年大庆，去年，我受命编本校的校史。《记忆》的高校专辑给了我不少灵感和启发。我喜欢看老前辈的文章，人大的陆伟国老师、北大的吴琼老师、地院的宋翔燕老师的回忆录都让我感动，使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清晰的认识。

有人认为北大两派不应该再打笔仗。我的看法是，强扭的瓜不甜，把各自的不满、冤屈、怨恨说出来也是好事。其实修史是需要不同的声音的，相信未来的史学家能从两派的吵架中发现真相。■

2017-8-28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老方 祛病

本期版式：言秀

本期封面：清水